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 / 44 / 635
17 October 1989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第四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保护智利境内的人权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各会员国转交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多·博略·希门尼斯教授（哥斯达黎加）按照人权委员会 1989 年 3 月 8 日第 1989 / 62 号决议第 9 段就智利境内人权情况编写的报告。

附 件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编写的
关于智利境内人权情况的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次</u>
一、 导言	1-8	3
二、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9-15	4
三、 智利政府对特别报告员以往报告中所转载侵犯人权 指控的答复	16-101	6
四、 智利政府报告的恐怖行动	102-103	31
五、 新的侵犯人权的指控	104-106	32
六、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其他指控	107-109	55
七、 结论	110-134	56
八、 建议	135-152	59

一、 导言

1. 自 1974 年以来，人权委员会和大会一直在审查智利境内人权情况。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也讨论了这一项目。

2. 人权委员会按其 1979 年 3 月 6 日第 11 (XXXV) 号决议，任命了一名特别报告员调查智利境内的人权情况。随后，委员会在 1980 年 2 月 29 日第 21 (XXXV) 号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将智利境内的失踪人员问题列入其报告内。

3. 关于这一问题的特别报告员依次是：阿卜杜拉耶·迪埃耶法官（塞内加尔）、拉吉苏默·拉拉赫法官（毛里求斯）和 1985 年 2 月 1 日上任的现任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多·博略·希门尼斯教授（哥斯达黎加）。

4.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在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后，于 1988 年 12 月 8 日通过了题为“智利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的第 43/158 号决议。在第 10 段中，大会

“请人权委员会考虑到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及现有有关资料，在其第四十五届会议上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审议智利境内的人权情况，还要考虑采取必要措施以恢复智利境内的人权——包括延长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并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5.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关于智利境内人权情况的第八次报告 (E/CN.4/1989/7)。在对该报告进行审议之后，委员会于 1989 年 3 月 8 日通过了第 1989/62 号决议，委员会在该决议第 9 段中

“决定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一年，并请他就智利的人权状况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和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在第 11 段中，委员会

“决定在其第四十六届会议上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审议智利境内人权状况并

确定在议程上如何根据人权状况发展对该项目进行处理。”

6.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 1989 年 5 月 24 日第 1989 / 147 号决定的形式核可了委员会第 1989 / 62 号决议。

7. 特别报告员按照上述各项决议，谨此提出 1989 年关于智利境内人权情况发展的临时报告，以供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审议，这也是博略教授的第九次报告。这次，他从智利政府以及其他有关方面得到了资料，它们向他提供了与其任务有关的证词和文件。他根据智利批准的各项国际文书内所规定的规范和被公认为普遍适用的其他国际人权法规范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分析。

8. 本报告主要涉及 1989 年的上半年（1 月到 6 月）。但是，如有特别理由，对在这个期间以前或以后获得的资料也一并加以考虑。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第五节中还列入了据称在他第四次访问智利（1988 年 10 月 2 至 10 日）之后，即在 1988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间发生的关于侵犯人权的指控，这些指控未能包括在他提交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前一次报告（E / CN.4 / 1989 / 7）之中。

二、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9. 特别报告员在 1989 年 3 月 31 日的信中通知主管人权事务副秘书长，由于健康原因，对于再次延长委员会原在 1985 年 1 月赋予他的任务，他遗憾地不能接受。他补充说，在过去的四年里，尽管存在一些与其工作无关的困难和问题，但由于他对智利人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精神上感到极大满足而得到补偿，这些步骤深刻地表达了他们在代议制民主政体——它对个人因有人权提供充分的司法保护——下生活的决心。因此，他要求把他辞去特别报告员职务的决定通知人权委员会。

10. 1989 年 4 月 20 日，主管人权事务副秘书长致函特别报告员，请他从他在处理智利问题的四年中所积累的经验出发重新考虑他的决定。在 1989 年 5 月 4 日的信中，特别报告员回答说，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很遗憾，不能改变他放弃人

权委员会所赋任务的决定。

11. 因此，人权中心于 1989 年 5 月 10 日将特别报告员的决定转告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主席和智利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委员会的官员也及时得到了通知。

12.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主席于 1989 年 6 月 22 日致函博略教授，促请他重新考虑他的决定以便他能够继续履行他在人权事业中作为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最后，博略教授于 1989 年 7 月 3 日通知人权委员会主席，由于他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他将继续承担其任务。他还表示希望他能够对智利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权事业有所助益。以普通照会的形式把他的决定通知了智利政府；其他有关方面亦通过 1989 年 7 月 20 日第 HR / 2397 号新闻稿给予了通知。

13. 在外交部长 1989 年 5 月 2 日的信中，智利政府通知秘书长，由于特别报告员出于健康原因决定不同意延长其任务期限，它不准备在今后接受对智利境内人权状况采取一种临时办法，因为经验已表明对于智利来说，这样一种方式的合作是无意义和无成效的。这位部长说，他的政府的合作并未得到负有保护人权责任的联合国各机构的赞赏，这些机构坚持采取一种歧视性的、有选择的不公正态度，这不仅与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不符，而且与智利境内所取进展的客观事实也不符。但是，这位部长还宣布说，其政府将继续逐步采取旨在增强保护人权的内部措施，并依照秘书长的意见随时向他通报这方面的进展情况。

14. 在博略教授由于其健康状况明显好转而于 1989 年 7 月 3 日决定继续担任特别报告员之后，智利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于 1989 年 7 月 20 日向人权中心寄送了第 271 号普通照会，重申其政府对于临时方法不予合作的决定并指出这是最后决定。

15. 1989 年 9 月 11 日，特别报告员致函智利外交部长，表示他希望与该政府恢复多年来已习惯的工作关系。他补充说，那种关系不仅对于该国政府，而且

对于联合国和特别报告员来说都是非常有成效的，这正象他在他的数次报告中一再指出的一样，自他于1985年2月开始作为特别报告员进行工作以来，智利境内的人权情况已在逐步、持续地改善。他最后说，他相信智利政府将会找到一种恢复在特别报告员履行其任务过程中与其合作的途径。特别报告员还说他相信智利政府将会按照对他以前四次正式访问所确定的程序再次允许他对智利进行与其任务有关的访问。到目前为止，特别报告员尚未收到对其信件的答复。

三、智利政府对特别报告员以往报告中 所转载侵犯人权指控的答复

16. 特别报告员在第四次访问智利期间（1988年10月），亲自从警察总局局长、侦缉局局长和国家情报中心主任那里收到了对特别报告员于1988年10月14日向大会提出的关于智利境内人权情况报告（A/43/624）第三节（第10-41页）中所转载侵犯人权指控的调查结果。这些指控是在早些时候在以1988年9月2日备忘录的书面形式向智利政府转交的。

17. 由于不可能在上述报告中分析各安全部门负责人对指控所作的答复，因此特别报告员在该报告后面附有外交部1988年10月7日的来文，文中概述了各安全部门负责人交给他本人的资料（见A/43/624，附录一）。

18. 本报告对各警察和保安当局在智利提交的所有材料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是在简单提及特别报告员提交大会的报告（A/43/624）中所转载指控之后对案件逐一进行分析的。每一案件的编号与前一份报告相同，字母A代表生命权、B代表身心不容侵犯权、C代表自由权、D代表安全权、E代表获得正当审判和诉讼程序保证的权利、F代表言论和新闻自由权、G代表自由进出国境权。

A.2 Alberto Recaredo Gallardo Pacheco, Catalina Ester Gallardo
Moreno, Roberto Gallardo Moreno 和 Mónica del Carmen

Páchecho Sánchez 据称，他们于 1975 年 11 月被侦缉局逮捕并于其后不久被杀害。当时，侦缉局和国家情报局报告说这四个人是“极端分子”，他们在与保安部队的冲突中死亡。投诉人——受害人的亲属——坚持认为，所谓冲突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受害人当时在拘禁中。

19. 侦缉局通知特别报告员说，受害人均为左派革命运动成员，他们既未被保安部队传唤，也未被逮捕，而且后者并未参与造成他们死亡的那次冲突。国家情报（其前身为国家情报局）证实了这种说法，它通知特别报告员说，受害人均为左派革命运动“抵抗委员会 21”成员，其中一人在 1975 年 11 月 17 日对卡耶比奥比奥的一个军事单位的攻击中死亡，其余三人于两天后在拉林科纳达-德迈普山的一次冲突中死亡。

A.3 Roberto Eliecer Valdebenito Vera 他是在警察向纪念国际妇女节的一支和平游行示威队伍开枪时受伤而于 1988 年 3 月 10 日死亡的。杀害他的人未给以任何帮助。

20. 警察总局报告说已提出行政诉讼，确认警察部队人员参与了该事件并对袭击他们的行为作出了过火的反应。刑事被告已受到惩罚，而且已向军事法庭提出了一项诉讼。法庭尚未作出判决。

A.4 Francisco Villalón Pérez, Claudio Paredes Tapia 和 Nelson Carrido Cabrera 这些青年学生于 1988 年 1 月在圣地亚哥 Villa Portales 的一家公寓发生爆炸时死亡。据原告指控，有情况表明这是一起杀人案而不是意外事件。

21. 据侦缉局 1988 年 4 月 8 日提交圣地亚哥第二十五刑事法庭的报告称，未发现任何可疑者，也没有证据说明有第三方参与。但是，该报告并未得出智利外

交部致特别报告员函件中那样的结论，该函件声称受害人系在处理他们自己的爆炸物时意外死亡（见 A / 43 / 624，附录 I）。

A.5 Martin Alejandro Oyarce Guarda 据称，他是被追逐他的警察开枪打伤致死的，后来警察把他抬到他们的车上。

22. 据警察总局称，他们发现 Oyarce Guarda 因枪伤躺在街上，他们遂用警车将其送到一家医疗中心。他们说，与死者亲属所说的相反，当时并没有其他平民在场，而且受害者也并未受到警察追逐。

B.6 Enriquela Yao Moreno 她坚持说侦缉局人员对其住宅进行了袭击，这些人并未出示任何主管当局的搜查证，并在审讯她时对她进行虐待。

23. 据 1987 年 8 月 6 日第 580 号报告，侦缉局殴打调查小队通知圣地亚哥第二军事法庭，由于被指控为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成员、在押犯 José Francisco Silva Hidalgo 的法院外的供述，Yao Moreno 已被逮捕，因为他们声称该成员曾参加许多次犯罪行为并利用某个称为“Enriqueta”的人传送消息。Yao Moreno 在给侦缉局的一份法院外供词中承认她“同情共产党人”并拥有在她家发现的“颠覆性印刷品”，但否认被利用作为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成员的传递消息渠道。侦缉局说，Yao Moreno 是根据 1987 年 8 月 3 日第 6281 号非常法令逮捕的。

B.7 Horacio Díaz Trujillo 他坚持认为他是在街上被持械平民逮捕的，这些人后来对他进行拷打。

24. 侦缉局报告说，国家情报中心工作人员根据特别军事检察院的命令将该在押犯移交给他们，是该检察院下令将其逮捕的，以调查他参与劫持 Carreño 中学校事件的情况。根据侦缉局提供的资料，Díaz Trujillo 于 1987 年 12 月 9 日晚 10 时 45 分被他们拘留。当天夜间 1 时 15 分对该被拘留者进行身体检查的 Pedro

León R. 医生报告说他未受伤。但是，于第二天晚 9 时 20 分对该被拘留者进行体检的 Juan Ritz Pérez 医生发现在双臂上均有损伤（直径为 1 厘米的圆形青肿）。

B.8 Cecilia de la Mercedes Cid Espina. 她坚持说，在她和她的兄弟被捕后，她遭受酷刑折磨达两天半之久。

25. 侦缉局报告说，已作为一名“极端分子”而记录在案的 Cid Espina 与其他三人一起因违反第 17798 号和第 18314 号法令而遭到逮捕。他们还坚持说她是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成员，而且她和同她一起被捕的其他人都参与了一些犯罪活动。他们说，在她住宅内发现藏有武器和颠覆性印刷品这一事实可以作证。在向侦缉局成员提供的法院外供词中该受害人承认她是 Milicias Rodriguistas 的一名成员，承认她参加过多种政治宣传活动，也承认她在家中藏有武器。

B.10 Miguel Silva Acuña 和 Patricio Oros Gallardo. 他们声称他们在其工作地点被侦缉局人员逮捕，后被拘留在一个警察营地，他们在那里被审讯时遭受电刑的折磨。

26. 侦缉局确认投诉人根据圣地亚哥第十六刑事法庭下达的调查令（第 24757-D 号案件）而被逮捕。他们说，他们在得到被拘留者否认参加 Ahumada 药房抢劫事件的供词的当天便将这些人释放了。

B.11 Virginia Yolanda Muñoz Matamoros. 她指控说，她曾被持械平民劫持、非法逮捕和拷打，这些人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对她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她声称，在她被劫持期间，她受到威胁，殴打并被迫在一份不允许她看的声明上签了字。

27. 侦缉局坚持认为，她被国家情报中心所逮捕是根据内务部第 6638 号非常法令而下达的命令，而且在她家中发现藏有一支“勃朗宁手枪、一颗巴西制 M-9 式手榴弹、导火索和导线”。

B.12 Ernesto Jeria Salinas. 他说他和他兄弟被在检查一辆小型公共汽车

的警察所逮捕，这些人强行进入他的住宅并非法进行了搜查。在审讯期间，他和他兄弟都受到电刑的折磨。

28. 警察总局说，Jeria Salinas是由于行为可疑而在远离其住宅的地方被捕的并交由下令将其拘留五天的内务部处理。他们说，他在1983年是根据国内治安条例被捕的，在1985年则是作为一名袭击警察营地的嫌疑犯而被捕的。他们坚持认为，他们是根据法律行事的，而且没有任何非法胁迫。

B.13 Manual Antonio Ortiz Lecaros.他说他被持械平民逮捕，他们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在拘留期间他受到胁迫和粗暴对待，他的身体被施以电刑。

29. 侦缉局说他们从未逮捕过 Ortiz Lecaros。

B.14 Rosa Estela Correa Herrera.她说她是在其住宅被一些便衣和警察搜查之后被捕的，这些人未出示任何搜查证。她遭到紧张的盘问，尽管她已77岁且健康状况不佳，她仍被迫坐在椅子上过夜。

30. 警察总局说，Correa Herrera是由于有参与袭击伦卡警察局的嫌疑而在其住宅外边被捕的，她已于次日被释放。

B.15 Rosa María Olivier Manríquez.她说她被一名持有一支左轮手枪的身份不明的人击中左手，当时该人抓住一个年轻人的脖子，围观的人群——她亦在其中——要他放开年轻人。

31. 警察总局报告说，在一次示威游行中，有人向一个在外购物的便衣警察投掷石块，使其头部受伤。该警察设法抓住了袭击他的人，但其他人则力图阻止他，所以他先向空中开枪，然后向攻击他的那些人开枪。军事法庭已被告知此事，该开枪者亦交由它们处理。在发现 Olivier Manríquez 受伤后，即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有关该事件的报告。

B.16 Marcos Villanueva Vinett.他说，他和拉维多利亚棚户区的另一些

居民被逮捕并被带到第十二警察局，在那里他受到审讯，同时身体受电刑。他说他还受到行刑队的模拟处决并被迫在不许他看的一份声明上签了字。

32. 警察总局报告说，他被捕时携带一支装有一个弹夹和 16 发子弹的斯塔特手枪、关于如何制造炸药的印刷品以及正在执行任务的部队正式营地清单。他们说，他所以被捕是因为自 1984 年 2 月以来他曾参与了 17 次犯罪活动（安装爆炸装置、烧毁公共汽车、袭击一辆警方汽车以及对警察营地进行抢劫和袭击）。警察总局坚持认为，Villanueva Vinett 是一个职业恐怖分子，他们是根据法律行事的，关于他们使用了不必要的暴力和进行模拟枪决的说法是不真实的。

B.17 Roberto Marcelino Jerez Campusano 他说他是被特警部队逮捕的，他们将他带到华尼塔阿吉雷地方警察局，在那里他挨了打，多处受伤，脊背可能骨折。

33. 警察总局说，他们没有任何关于逮捕 Jerez Campusano 的记录，因此对他们的指控是不真实的。

B.18 Jaime Antonio Cubillos Soto, Yachyn Cubillos Soto 和 Rodrigo Jabalquinto Ramírez 他们说他们是被警察非法逮捕的。Jaime Antonio Cubillos Soto 还指控说，在他被捕时和在所有人被带到的第二十六警察局，他都遭到殴打和骚扰，全身受到电刑。

34. 警察总局说，Yachyn Cubillos Soto 是由于违反了反恐怖主义法而被逮捕的，并被指控参与了四次利用爆炸装置进行的袭击行为。他们说在他被拘留期间，红十字会的多名医生曾对他进行探视。他们坚持认为，他们是根据法律行事的，关于被拘留者遭受了电刑或者非法胁迫的说法是不真实的。

B.19 José Armando Muñoz Ramírez 他说他被自称来自侦缉局的穿便衣的人逮捕。他声称他们拷打了他，对他的双手和太阳穴施以电

刑。

35. 侦缉局声称，Muñoz Ramírez 不是被该局警察逮捕的，在其卷宗中没有关于这次逮捕的任何记录。

B.20 Gerardo Alberto Díaz Sepúlveda 他指诉说他被当时在追赶若干参加示威的青年的特警部队成员所殴打。由于受到一种橡皮警棍的猛击，他头部受伤，几乎昏倒。

36. 警察总局说他们没有任何关于此事的消息。

B.21 Carlos Patricio Cid Bóez 他说他是被车牌号为 RP-379 和 RP-297 的巡逻车上的警察逮捕的，并被带到圣阿德里亚娜地方分局，在那里他遭到毒打。由于挨打，他不得在博罗斯卢卡医院接受紧急手术，医院对他的诊断是“腹部受伤并发症”。

37. 警察总局坚持认为他是因为在马路上酗酒而被捕的，交由圣米格尔第五法庭处理，后又移交给当地警察部门。

C.22 José Agustín Fuentes Vidal 他说他在侦缉局昆塔诺莫尔分局被捕，当时他被该分局传唤。他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被交给法官审理，而且当他的太太询问他的下落时，她得到的答复是该局并无此人。

38. 侦缉局报告说，正如第 170 号报告所示，Fuentes Vidal 在其被捕之日已交由圣地亚哥第二十四刑事法庭审理，他们已附该报告副本一份。

C.23 Patricia Roxana Depueto Sáez 她母亲说，她是被身着便衣的侦缉局和国家情报中心人员所逮捕，这些人非法闯入她家搜查她的父亲和哥哥，并拿走属于她家的 28,000 比索。

39. 侦缉局报告说，Patricia Roxana 和其他人一起由于违反第 17798 号和第 18314 号法令和有参加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嫌疑而被捕。正如

1988年2月4日第126号报告所记录的，她被交由圣地亚哥军事检查官办事处审理，他们附了该报告副本一份。在给侦缉局的一份法院外供词中，Patricia Roxana 承认她原与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有联系，但在其领导人向她展示一把机关枪和两支左轮手枪后即与之脱离关系。她还声称，在她与该组织有联系期间，她曾帮助组织社会、民间和体育活动，旨在吸引新成员。

C.24 Sergio Gonzáles Torres 作为达维拉棚户区人权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说他被警察毫无理由地逮捕。

40. 警察总局说，他是作为一名可疑分子而被拘留八小时的，在发现未对他提出任何指控时即将他释放。他们声称，他的被捕与他是上述委员会成员的事实无关，而是涉及到一起普通刑事犯罪。

C.25 Liliana del Carmen Montenegro Rebolledo 她声称她是在一些身份不明的便衣人员非法强行闯入她家后被擅自逮捕的并受到虐待。

41. 国家情报中心报告说，Montenegro Rebolledo 是由于充当了某些颠覆和恐怖活动的同谋，因此根据内务部第66.034号非常法令在侦缉局所在地被关押了五天。但是，侦缉局报告说，Montenegro Rebolledo 并不是被该局警官逮捕的。

C.26 Víctor Herrera García 他说他是被非法搜查其住宅的特警部队持械人员擅自逮捕的。他说，他的邻居，一个叫Oswaldo Celis的警察曾威胁要以他未犯过的罪行报警。

42. 警察总局说，Herrera García 不是根据第二军事检察院1988年4月4日第425号命令被捕的，两个半小时之后他即被释放。他们还说，这次逮捕与Herrera García 对其邻居的指控无任何关系。

C.27 Julio Peralta Barahona ,Horacio Zea Escobar和另外六人 一份请

求保护书声称，他们在参加一次纪念国际劳工节的公众活动之后被警察逮捕。该请求书说，被捕者在被逮捕时以及在第十二警察局都遭受毒打，据对他们进行的体检报告所述，在被捕者中有三人受伤。

43. 警察总局说，这次逮捕是在参加上述活动的某些人引起骚乱之后发生的，被捕者交由内务部处理。他们补充说，当他们到达警察局之后，由一名医生对被捕者进行了检查，他发现其中有三人受了轻伤，有一人患心机能不全症，一人患腹泻。警察总局声称，他们根据法律和条例规定接受了治疗。

C.29 Raúl Hernán 和 Miguel Angel Cárdenas Alvarez, Ruth Cabrera Hinostroza, Virginia Yolanda Muñoz Matamoros, Cecilia de las Nieves Novoa Carrasco, Raúl Armando Figueroa Guajardo 和 Marcos Guajardo Morales. 在他们被捕后，他们被拘禁在秘密拘留所——这种做法严重地违反了《宪法》第 19 条第 7 (d) 款的规定。法律也规定，拘留期间只能将被拘留者关在有关人员的家中，或关在一座监狱或公共拘留所。

44. 侦缉局说，Raúl Hernán 和 Miguel Angel Cárdenas Alvarez 是在根据内务部第 6514 号非常法令而由国家情报中心人员逮捕之后移交给他们的。他们补充说，这两人被指控为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成员并参与劫持了 Carreño 中校。国家情报中心说，由于违反第 12927 号国内治安条例和第 17798 号军火和爆炸物管制法而下令逮捕他们的，因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两支左轮手枪和一部对讲机。该局说，Muñoz Matamoros 是由于她家藏有“一支布朗宁手枪，一颗巴西造 M-9 式手榴弹、导火索和导线”而根据第 6638 号非常法令被捕的。情报中心说，在被捕后，Novoa Carrasco 由于她与属于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极端分子的联系而交由特别军事检察院审理。她于两天后被释放。最后，情报局说

Figuroa Guajardo 和 Guajardo Morales 是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成员，因此在被捕后交由特别军事检察官审理。

C.30 Miguel Arriagada和另外46人.他们说，他们是被身份不明的便衣人员逮捕的，这些人对他们所居住的 Villa Venezuela 贫民窟进行了大规模搜捕。

45. 警察总局确认了这次逮捕，说逮捕行动是在 1988 年 5 月 26 日早 6 时至中午 1 时 30 分进行的，目的是核实被指控参与极端分子袭击行为的情况。

C.31 Corina del Carmen Vasquez Ramírez, Orlando Francisco Vásquez Ramírez 和另外一些人. Corina del Carmen 坚持认为，她家庭的几名成员是被侦缉局和国家情报中心人员逮捕的，他们对她的住宅进行了搜查，造成严重损失，并粗暴地对待她的家人。

46. 侦缉局报告说，Orlando Vásquez Ramírez 是由于被控违反第 17314 号反恐怖主义法和第 17798 号军火和爆炸物管制法而根据第二军事法庭（特别军事检察院）1988 年 5 月 26 日第 1290 号法令被捕的。根据这项法令，殴打调查小队有权逮捕有与 Manuel Jesús Rubio Bravo 所供活动直接有关的负责、同谋或隐藏行为的可疑分子，以及有权对可能窝藏可疑分子、调查中犯罪活动所使用的工具、或者可作为证据的书籍、文件或物品的房屋强行进入并进行搜查。这项法令还允许单独禁闭被拘留人员。

C.32 Mauricio Acuña Durón, Marta Aranís Aranís, Sergio Aranís Contreras, Erika Arce Póvez, Matilde Arce Póvez 和另外 16 人.他们说在他们绘制一幅以人权为主题的壁画时被警察逮捕。

47. 警察总局说，他们正在公共财物上“刷写被查禁的共产主义运动标语时被抓获”，而内务部命令实施国家治安条例，所遵循的诉讼程序亦符合法律规定。他们补充说，被拘留者都接受了体检。

C.33 Cecilia Reyes Rodríguez说她于1988年5月被20名使用私人车辆和侦缉局车辆的便衣人员逮捕，他们未出示任何司法令状。她说，这些人员对她家粗暴地进行搜查并造成损失，当她到达侦缉局总部时受到殴打并且在接受盘问时受到威胁。

48. 侦缉局报告说，在1988年的任何时候 Reyes Rodríguez 都没有遭到该局人员的逮捕。他们回顾说，在1984年3月她曾因流浪罪被逮捕。

C.34 Alberto Chiang Muñoz和 Eduardo Francisco Montecinos Fierro。他们说他们因参加一次学生的和平示威游行而被警察逮捕和毒打。

49. 警察总局说，他们是由于在大街上妨害社会治安、阻碍交通和向私人车辆投掷石块和重物而被逮捕的，警察采取了适当行动以控制这次妨害治安的活动。曾对这些被拘留者进行了体检。

C.35 Carlos Humberto Rojas Albornoz 和 Pablo Esteban Aguilera Inostroza。据称，他们是在街上走路时被警察逮捕的，他们没有任何不良行为。两名被拘留者都受到盘问，其中一人遭到殴打和威胁。

50. 警察总局坚持认为，他们是根据法律行事的，被拘留者是因为行为可疑而被捕的，在对其行为调查期间交由内务部审理。他们补充说，对这些被拘留者进行调查是因为他们拥有炸药和雷管，而且把这些装置藏在身上带到警察营地附近。对这些被拘留者进行了体检。

C.36 Mario Campónico Susarte, Gustavo Cubillos Rojas, Paulino Díaz Rivera, Guillermo Gómez Tapia, Juan Lasen Pino 和另外 12 名学生。他们说他们是在参加一次支持他们要求的罢课行动后离开 Blas Cañas 职业培训学院时被警察逮捕的。

51. 警察总局说，上述学生与另外大约 300 名学生是由于阻碍车辆通行和妨害街道治安而被捕的，警察是遵照确保公共秩序的习惯程序行事。对这些被拘留者进行了体检。

C.37 Marco Antonio Lagos Casas-Cordero, Paulina Nova Contreras, Claudia Lagos Nova 和 Silvia Liantón Saavedra. 他们控告警察总局人员非法进入住宅、擅自逮捕、进行破坏和偷窃。

52. 警察总局说他们没有关于这一案件的任何消息。

C.38 Marcelo Abrigo Parra, Marcela Acevedo Medina, Eduardo Acuna Cataldo, Alvaro Acuña Vercelli, Daniela Ahumada Araya 和另外 190 名圣地亚哥职业培训学院学生. 他们说他们是在该培训学院院长召来警察制止学生和平示威之后被警察逮捕的。

53. 警察总局坚持认为他们是依法行事的，因为这些学生在 Félix Lagrese Byrt 院长的请求下被驱逐。

D.39 René Miranda Barrales. 他母亲说，警察通缉他的理由是在 Villa Portales 公寓三名青年因爆炸身亡的现场发现了他的 1986 年的大学学生证。

54. 侦缉局报告说，他未被该局任何人员所逮捕，但是他们补充说他在过去曾两次被捕（1984 年和 1986 年）并被列于圣地亚哥大学闹事学生名单之中，他在 1985 年被该校开除。

D.41 Guillermo Antonio Póvez Guerra. 他被一些身份不明者逮捕，当时他斥责了一些不相识的人，因为这些人在纪念 André Jarlón 神父的壁画上乱涂。Póvez Guerra 声称，在被拘禁期间挨了打并受到被杀害的威胁。

55. 侦缉局坚持说 Póvez Guerra 并未遭到该局人员的逮捕。

D.43 Carlos Valencia García, Jeanette Valencia García, Mauricio Andrés Valencia García, Osvaldo René Gallardo 和 Mario Valenzuela Martínez.以他们的名义提出的请求保护书指出, 一些身份不明人士一直在调查请求人及他们的活动, 使他们对自己的安全感到不安。

56. 侦缉局说, 他们未被该局任何人员逮捕, 在警察卷宗中没有他们的任何记录。

D.44 Francisco Marcelo Alea, Nelson Soza, Gonzalo ode 和 Owana Madera.在以他们所代表的这些智利青年的名义提出的请求保护书中, 他们声称, 在过去的一年里, 居住在大都市区的青年一直是国家安全机构和准军事帮派组织各种迫害的受害者。他们说, 在1987年8月到1988年2月间, 发生过对青年人的非法逮捕案932起, 威胁案173起和绑架案27起。

57. 侦缉局确认, 这些请求人都是青年组织的领导人。他们指出,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被该局人员逮捕的, 而是几次被警察总局逮捕的。

D.45 Luis Baeza Torrealba 和 Raúl Hogervoet von Vliet 神甫.以他们的名义提出的请求保护书称, 他们二人受到过一个称为“ACHA”(智利反共行动)的组织的威胁。据称, 上述组织在1988年期间已威胁过瓦尔帕拉索的200多名政治和社会领导人。

58. 侦缉局说, 这两名神甫曾两次向拉利奎亚市警察局报告他们的教堂受到破坏。正如向卡维尔多地方治安法庭所报告的, 调查毫无结果。警察总局说, 他们的卡维尔多分局局长曾与这两名神甫谈过话, 发现他们并没有真的接到过威胁电话, 而只是接到了这样一个通知:“神甫们要照顾好你们的全体教徒, 我们不想登门拜访了, 我们知道你们是什么玩意儿”。警察总局通知了治安法庭并作了安排, 将

这一地点置于特别监视之下。

D.46 Lorena de los Angeles Nazal Saglie, Gabriela Medina, René Roa, Carla Cristi 和 Nadia Loyola.由 Lorena de Los Angeles 提出要求保护的请求书声称，女演员 Nazal Saglie 已被四个人绑架到一个私人住所，在那里她受到盘问并遭到殴打、威胁和侮辱。

59. 侦缉局的报告说，该请求已被驳回，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这次绑架。至于也受到“特里扎诺 135 敢死队”和“ACHA”威胁的女演员 Medina、Loyola 和 Cristi，侦缉局报告说，Medina 过去曾由于散发“颠覆性小册子”和参加反政府示威游行而两次被捕，警方没有 Loyola 的记录，而 Cristi 是反对派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联合会成员。

D.48 Juan Rafael Alfaro Fuentes.他坚持说，当他履行兵役义务向昆塔诺莫尔征兵处报到时，他受到平民和军事人员的粗暴盘问，遭他们殴打和威胁。

60. 国家情报中心说，Alfaro Fuentes 被捕是由于参与了一所中学的一些事件以及分别在 1985 年 7 月和 8 月自愿接管另一所中学。1986 年 7 月，他领导了一次公众示威游行，同年 12 月，他的名字出现于正在古巴学习的人员名单上。

D.49 Rosa Elvira Riquero Núñez.她声称有 25 人强行闯入她的家中搜查武器，她的四家邻居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61. 侦缉局说，她未被该局任何人员逮捕，其卷宗中没有任何有关她的记录。

D.50 Hector René Mirando Luengo.他声称他在他家中被侦缉局的便衣人员逮捕。在被拘禁期间他遭到毒打，并一直被蒙住眼睛。

62. 侦缉局报告说，Miranda Luengo 未曾被该局人员逮捕。

D.51 Bernardo Arroyo Garabito.他声称他受到了称为“ACHA”组织的威

胁。

63. 侦缉局报告说，根据上诉法院的命令，特木科省进行了一次调查，但无结果。

D.52 Reberto Ignacio Ramírez Valle.他声称他被绑架并被盘问达一个半小时，同时受到殴打和威胁。

64. 侦缉局报告说，Ramírez 未曾被该局人员逮捕。

D.53 Pedro Segundo Ortiz Navarrete.他说他家曾两次遭一些人非法闯入，第一次是警察总局警察，然后是侦缉局人员。

65. 警察总局说，他们没有参与所指控的事件，也未对 Ortiz Navarrete 提出任何指控。

D.55 Mónica Emilia Alvarado Hinostroza.她声称，当她合法回到智利并在机场办理通常手续的时候警察拿走了她的手提包。除其他东西外，她的手提包内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给她的1,005美元。虽然她提出了正式申诉，但没有任何警察机关对这起偷窃行为承担责任。她还说她一直被跟踪。

66. 侦缉局报告说他们没有任何关于 Alvarado Hinostraza 的资料。

E.56 Nelson Donato Guzmán, Manuel Rodríguez Fuentealba, Lindo Ruíz Barriga, Florisondo Trocoso Puente, Luis Walter Valdes Pulgar 和 Luis Enrique Silva Rojas.他们说在被国家情报中心官员逮捕后受到非法胁迫。

67. 国家情报中心说，Donato Guzmán, Rodríguez Fuentealba, Ruiz Barriga 和 Trocoso Puente 是由于拥有炸药、武器和计划而根据内务部 1986 年 9 月 8 日第 53 号最高法令被捕的。情报中心坚持认为他们都是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搞颠覆活动的犯罪分子。情报中心报告说，Valdés Pulgar 是由于在一次总

罢工期间进行和鼓动颠覆活动而根据内务部 1986 年 7 月 2 日第 6021 号非常法令被捕的。它说 Silva Rojas 是于 1987 年 3 月 17 日被捕的，并由于拥有爆炸物而交由圣地亚哥第一军事检察院审理。

F.62 Isabel Hermosilla Pérez, Eduardo Garretón Suazo 和 Ivonne Constancio Rojas.他们是在散布主张在公民投票中投“反对”票的政治宣传言论时被警察逮捕的。

68. 警察总局说，他们由于利用为前共产党辩护的标语口号进行宣传而被捕并交由内务部审理的。

G.64 Sergio Poblete Garcés, Efraín Jaña Girón, Ernesto Gálaz Guzmán, Alamiro Castillo Aliaga, Otto Becerra Schwart 和其他 21 名前军人 据称，他们是在 1975 年被流放国外的，并自那时起一直被禁止入境。

69. 根据提供给特别报告员的关于按照内务部 1988 年 9 月 1 日第 303 号最高非常法令入境的人员的报告，上述 26 人中有 3 人已回到智利。

70. 应当指出，特别报告员没有收到智利政府关于文件 A / 43 / 624 中所述下列案件的任何资料：

- A.1 Hernán Elías Chamorro Monades
- B.9 Mauricio Alejandro Bello Cortés
- C.28 Claudio Antonio Aravena Baeza 和 Manuel Castañeda Martínez
- D.40 Reinaldo Oscar Flores Morales
- D.42 Saúl Barzilla 和 Elgueta Matamala
- D.47 Juan Manuel Muñoz Gatica
- D.54 Isaías Libertario Duque Jorquera
- E.57 Mario Vega Varas

- E.58 Godoy, Nelson 和其他人
- E.59 José Galiano, Carmen Hertz, Sebastián Hamel, Alberto Espinoza, Carlos Margotta 和其他人
- E.60 José Galiano, Consuelo Gil Bessolo, Carlos Margotta, Alfonso Insunza Bascuñán, Roberto Garretón Merino 和其他人
- F.61 Manuel Casanova Azagra
- F.63 由于言论罪而被向军事法庭起诉的60名记者和反对政权者。

71. 特别报告员还于1989年3月7日收到了智利政府答复于1989年2月7日在圣何塞向Calderón大使转交的另一份投诉备忘录的资料。在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交的报告(E/CN.4/1989/7, 第三节)中转载了上述备忘录。

- A.1 Juan Fernando Mayorga Millán 他的尸体作为身份不明尸体于1988年7月16日夜交到Sótero del Río医院。警察局告知投诉者他是在袭击一个加油站时死亡的, 但是据他们称, 目击者说该袭击者的身体特征与Juan Mayorga的特征不符。

72. 警察总局报告说, Mayorga Millán与其他七人一起参与了1988年7月16日对拉西斯纳特一座加油站的持械抢劫。当一名警察在加油站抓住他们并认出他后, 他们开始射击。在警察还击时, Mayorga Millán受伤。

- A.2 Antonio Oviedo Sandova Cares 据投诉人称, 他于1988年8月30日在La Granja区被枪击中后死亡, 当时是一些人从他们乘坐的一辆小公共汽车中开的枪。在场的警察既没有试图追捕枪击者, 也没有尽力帮助受害者。

73. 警察总局报告说, 在进行调查之后宪兵队的一名人员由于涉嫌这次枪击事件而被捕, 调查结果已报告第十一刑事法庭。

A.3 Edison Freddy Palma Coronado据投诉人称，在他参加的一次示威游行被冲散之后被一个警官开枪打死。

74. 警察总局报告说，对这次事件的调查并未表明该局任何人员与 Palma Coronado 的死亡有牵连，这一事实已报告圣地亚哥第十一刑事法庭。

B.1 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 Flores据投诉人称，他于1988年3月12日在其住宅被捕并被罩住头带往圣米格尔第十二警察局，在那里他受到非常粗暴对待并被单独禁闭。

75. 警察总局说，他被捕是由于涉嫌参与1987年9月11日用轻武器和炸药在 Departamental 路与 Club Hípico 路交叉路口对一辆中型汽车袭击案。他们进一步指出，Sarmiento Flores 在被捕之后承认他曾参与了1984年对拉维多利亚警察局营地的袭击以及其他颠覆活动。

B.2 Jorge Luis Cortez Colina他指控，他于1988年5月17日被捕并被带到伦卡第七警察局，在那里他受到粗暴对待。

76. 警察总局说，他是被该局人员逮捕的，因为目击者认出他属于在1988年5月12日杀害警察 Samuel López Contreras 的团伙。已向圣地亚哥第二军事法庭提交了一份报告。

B.4 Ricardo Alberto Paredes Caro 和 Marcos Antonio Abarca González他们指控他们于1988年7月9日在街上受到一名便衣警察的枪击。

77. 警察总局说，该局两名人员逮捕了包括两名投诉人在内的五人。在逮捕过程中，一名警察使用了武器，将 Hugo César Candia Sotelo 以及 Abarca 和 Paredes 打伤，前者后来死亡，后两人分别为左手和上臂骨折。对此事负有责任的警官已被该局解雇，并交由圣地亚哥刑事法庭处理。

B.5 Claudio Fernando Escobar Reyes他指控他于1988年7月10日被

捕，后被带到第三警察局并在审讯过程中受到粗暴对待。

78. 警察总局说，他由于涉嫌参与了对警察的袭击而被捕。在确认他并未参与该次袭击之后即于次日将其释放。他们说他们绝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表明他受到非法胁迫和骚扰；警察日志表明，他并未受到伤害，他也未对逮捕他的警官提出任何控诉。

B.6 Francisco Osses Osorio 他指控，他曾在1988年7月11日被警察殴打，当时警察拦住他所驾驶的出租汽车，并命令他关闭发动机，他对此答复说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汽车有机械故障。

79. 警察总局的说法是：一名执勤警官为纠正违反交通规则行为拦住了Osses，而Osses从该警官手中夺他的驾驶执照并试图动手打该警官，扯坏了他的制服。该警官将他逮捕并将他带到第三十二警察局，交由第二军事法庭审理。

B.7 Enrique Octavio Quintanilla Lillo 他指控他在1988年7月15日遭逮捕时受了伤。

80. 警察总局说，在确认他曾参与了谋杀警察下士（二级）Jaime Sandoval Mendoza 案之后将其逮捕，并于1988年7月27日交付审判。

B.8和B.10 Juan Raúl Cáceres Espinoza, Iván Vera Medina 和 José Hernández Corvalán. Cáceres Espinoza 指控由于1988年7月31日在卡莱拉-德坦戈警察局被殴打而受伤。Vera Medina 和 Hernández Corvalán 声称，1988年8月8日他们被三名持械便衣拦截，这些人殴打了他们并把他们带到比库尼亚马肯纳第三十六警察局，他们在那里受到粗暴对待。

81. 警察总局指出，这三人由于涉嫌参与了一次抢劫案而于1988年7月9日被捕。他们在保安人员办公室在一份其大意是他们未曾受到警察伤害或粗暴对待的声明上签了字。

B.11 Claudio Leiva Sepúlveda. 投诉人声称, 1988年8月11日, Leiva先生被一名警察开枪击中头部, 该警察立即逃逸。其他警察随后包围了该地区, 拒不允许任何人靠近该受伤者, 也不给其以任何帮助。

82. 警察总局指出, 8月12日, 该局一名人员不得不使用武器以驱散正在凌辱一名妇女的八个人, 其中之一是 Leiva Sepúlveda. 他受了严重的枪伤。

B.13 Luis Espinoza González. 投诉人说, 1988年8月30日, Espinosa在街上遭到塞罗纳维亚棚户区罗斯福地方警察局三名警察的殴打。

83. 警察总局指出, 他们没有关于他所指控的逮捕的任何记录, 该局警察说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

B.14 John Rommele Hamberger. 他指控, 在1988年8月30日, 他受到警察的暴力袭击, 这些人既不打算弄清他的身份, 甚至也不想与他讲话。

84. 警察总局指出, 他们没有这次事件的任何记录, 因此不能确定谁参与了或者谁应对此负责。

B.15 Waldo Ernesto Seydewitz Valenzuela. 他指控, 他于1988年9月3日被捕并被带到 Lo Barnechea 警察局, 据称他在那里受到殴打。

85. 警察总局报告说, 他是在 Lo Barnechea 路和 La Cuenca 路交叉的地方被捕的, 因为发现他正在这一带邻里住房周围徘徊, 而且对他的这种行为也拿不出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当他在警察日志上一份大意是说他没有任何伤害并对警察没有任何控告的声明上盖章之后于同日被释放。

B.16 Nelson del Tránsito Paredes Manzor, Rodrigo Alberto Oliva Celis 和 Martín Enrique Miranda Tapia. 他们指控, 1988年9月9日

Rodrigo Oliva 和 Martín Miranda 的家遭一些便衣警察的突然搜查，他们未出示任何种类的令状。他们被带到阿尔韦警察分局，遭殴打后被释放，后又被警官逮捕，这次是与 Nelson Paredes 一起被捕的。第二次他们又遭到粗暴对待。

86. 警察总局指出，Miranda Tapia 和 Oliva Celis 被捕是因为他们被指控参与了放火焚烧主张在公民投票中投“赞成”票者的一处办公室的事件，并称他们坦率和自愿地在该警察局承认他们策划了在 Miranda Tapia 家这次犯罪活动。他们于 1988 年 9 月 10 日被转送到梅利皮拉警察部门，交由梅利皮拉第一刑事法庭审理。

B.17 Guillermo Alex Cáceres Astudillo 和 Jorge Antonio Muñoz Muñoz 控诉人称，这两个未成年人在 1988 年 9 月 10 日夜间接被两名警察殴打，并说当他们到警察分局寻找他们时，他们遭到警官的辱骂。

87. 警察总局报告说，仅就所能证实的情况而言，该局人员并未参与这些事件。

B.18 Hugo Rivas Lombardi 他指诉说，1988 年 9 月 18 日，当他去为其女辩护时遭六名警察的殴打，他女儿因举了一块主张在公民投票中投“反对”票的牌子而遭到攻击。他遭到逮捕并在被释前还得交纳罚款。

88. 警察总局指出，Rivas Lombardi 和 Rogelio Enrique Benavides Díaz 是被该局人员逮捕的，因为 Rivas Lombardi 与另外大约 20 人，以及 Rogelio Benavides 与另外大约 7 人，由于政治分歧进行了一场殴斗，Rivas 在其间受伤。其余人逃逸，只有 Rivas 和 Benavides 被捕；在核实了他们的家庭住址并让他们交纳罚款之后，将他们释放。

C.4 Maria Asunción Bustos, Victoria Gallardo, Teresa Rojo, Teresa Gómez Meyer, Sandra Radic 和另外 14 人。投诉人报告说, 上述人员于 1988 年 8 月 29 日在“妇女争取生存”小组举行的一次和平会议结束时被警察逮捕。

89. 警察总局指出, 他们由于在大街上有扰乱社会治安和破坏正常交通秩序而被捕。他们于同日被释放。已向圣地亚哥第三地方治安法庭提交报告。

C.5 Nelson Alejandro Carvaja Salinas 据投诉人称, 他于 1988 年 8 月 30 日被智利大学校园对面的特警部队逮捕。

90. 警察总局指出, 他由于在大街上有扰乱社会治安行为而被捕并于次日保释。已向圣地亚哥第一地方治安法庭提交了报告。

C.6 Carlos Carrasaco González, Daniel Paulus, Leandro Sepúlveda, Tito Soto 和 Alejandro Hidalgo 据投诉人称, 上述人员于 1988 年 8 月 31 日在圣地亚哥都市大学内被捕并被带到第十八警察局。

91. 警察总局指出, 他们是由于在大街上扰乱社会治安在 J.P. Alessandri 大道 774 号门前被逮捕的。对前三人参与这一事件的情况进行了审问, 后无保释放。已向纽尼奥阿第一地方治安法庭提出报告。

C.7 Rodrigo Daniel Paz Henriquez 据投诉人称, 他于 1988 年 9 月 6 日在圣地亚哥市中心被捕, 后被带至警察局并被指控袭击警察而出人意料地被交由军事检察院处理。

92. 警察总局指出, 他在 1988 年 9 月 7 日被捕是由于对一名警察进行人身伤害并使他受了轻伤。该案及其有关证据已交由圣地亚哥第二军事法庭处理。

C.8 Claudio Andrés Meneses Labraña 据投诉人称, 1988 年 9 月 8 日, 在他从智利人权委员会返回的时候被四名侦缉局人员逮捕。

93. 侦缉局指出, 根据少年犯罪问题小队第 1244 号警方报告, 他已交由圣

地亚哥第六少年刑事法庭审理，因为他被指控有扰乱社会治安行为，从而有一项逮捕他的命令。

C.9 José Santiago Navarrete Pereira, Omar Eliecer Herrera Martínez, José Abdón Cid Amaya 和 Gonzalo Torres Cid.据投诉人称，上述人员于1988年9月30日被侦缉局警官逮捕，这些警官未作任何解释，也未出示任何逮捕状。他们还毁坏了上述人员的身份证和选民登记证。

94. 侦缉局指出，上列前三人由于犯有并承认犯有一些暴力抢劫罪而且因其类似犯法行为而有待对他们颁发要执行的逮捕状，因而于1988年10月1日被殴打调查小队成员逮捕并交由圣米格尔第八刑事法庭审理。他们还说，警察拿走并毁坏了他们的身份证和选民登记证的说法是不真实的。至于 Torres Cid，他是于1988年10月1日在拉班德拉棚户区被捕的，在确认他并未参与所调查的事件之后，于同日将他释放。

D.2 Rubén Ibáñez López, Nolasco Tobar Vergara, Alex Mario Mardones 和其他人.他们指控在1988年5月28日，塞罗纳维亚和中央站社区的棚户区被警察和保安部队人员非法搜捕。

95. 警察总局指出，他们被捕是因为他们承认犯有许多根据第18314号反恐怖主义法应受惩处的违法行为，如持械袭击、使用爆炸物的恐怖攻击、携带和拥有自动武器等。已向圣地亚哥第二军事法庭提交了一份关于这些事实的报告。

D.8 Luis Alberto Moreno Correa.据投诉人称，他父母的住宅在1988年8月31日被寻找他的侦缉局人员搜查。

96. 侦缉局指出，该局人员是按照圣地亚哥第二陆军和警察总局检察官办事处颁发的关于逮捕他的命令而去 Luis Alberto Moreno 家住宅的，该办事处在第2122-87号案件中命令逮捕 Luis Alberto Moreno，因为他违反了第17798号军

火和爆炸物管制法。这项命令于 1988 年 9 月 15 日被同一检察官办事处颁发的另一项命令所取消。

D.11 塞罗纳维亚社区居民据投诉人称，在 1988 年 9 月 11 日夜间，一伙警察冲入该社区，造成大量损失，甚至开枪射击。

97. 警察总局报告说，从那日下午 4 时起支持在公民投票中投“反对”票者和支持投“赞成”票者之间不断发生了一些事件，致使警察分队进行干预。警察的一辆汽车被损坏，一名警官受轻伤。该局后来进行了调查，但是警察总局的任何人员都未卷入投诉人谈到的事件。已向圣地亚哥第二军事法庭提交了报告。

D.12 Grecia de Yanira Vargas Valencia 和 Manuel Jesús Henríquez Toro.Grecia Vargas 指诉说，她于 1988 年 9 月 15 日在街上遭警察骚扰和侮辱，而且在 1988 年 9 月 25 日，警察对她家进行了搜查但未出示任何搜查状，并且殴打了在场的人。

98. 警察总局指出，在他们的卷宗中没有任何记录可以使他们能够核实上述指控，而且在他们询问曾于 1988 年 9 月 5 日和 15 日在该棚户区执勤的警官时，他们未发现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警官曾参与上述事件。

D.15 Adriana González Barrios 和 Miguel Angel Aguilar Cerón.据投诉人称，他们乘坐的汽车于 1988 年 9 月 30 日被侦缉局人员拦截，这些人要求查看证明该车所有权、保险和车检证件并拒不归还，除非付钱。对他们来说，这类事件的发生已非首次。

99. 侦缉局指出，在上述日期，其警官在街上发现了犯罪分子 Miguel Angel Aguilar Cerón。Aguilar Cerón 注意到警车时，当即逃逸，他们未能将其捉拿归案。与投诉人的指控相反，未发生任何其他事情。

D.17 Johanna María Benech Marambio.她指控说，她于 1988 年 10 月 5 日在街上被警察拦截，后受到盘问和殴打。自她被释放以来，她

的住宅一直受到监视。

100. 警察总局指出，他们没有任何关于所控事件的资料。

101. 应当指出的是，在从智利政府收到的对特别报告员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最近一次报告（E/CN.4/1989/7）中所转载备忘录的答复的资料中并未提及下列案件：

- B.3 Franyio Zapata Nicolis, Diego Lira Matus 和 Miguel Montecino Montecino
- B.9 Luis Dante Longoni Vásquez
- B.12 Carolina Fuentes Pereira
- C.1 Oscar Guillermo Garretón Purcell
- C.2 Jorge Arturo Martínez Muñoz
- C.3 Elías Salomón Huaquimil Catril 和 Luis Eduardo Espinoza Fuentes
- D.1 René García Villegas
- D.3 Franyo Zapata Nicolis, Diego Lira Matus 和 Miguel Montecino Montecino
- D.4 Raúl Sergio Somadevilla Rivas
- D.5 Avelina Cisterna Aguirre
- D.6 Livio Ciangherotti Ciangherotti
- D.7 Alicia Odette Muñoz Jara
- D.9 Rogelio Eduardo Fuentes Bravo, Waldo Ernesto Seydewitz Valenzuela, Richard Orinson Vega Waghorn, Mónica Ruth Vega Quilodrón, Margarita del Carmen Vega Quilodrón 和 Mery Vega Quilodrón
- D.10 Nelson Héctor Rolando Nicalau, María Soledad Kunstmann

Almarza,Saledad Andrea Rolando Kunstmann 和 María Inés Osorio Romero

D.13 Víctor Rafael Aldea Ramos

D.14 Liliana del Carmen Manríquez Solano,Carlos Reyes,Elizabeth Soto 和 Rosa Muñoz Mora

D.16 Rodrigo Mario González López,Luz María Navarro Ceardi,Mariana González Navarro 和 Amparo González Navarro

E.1 René García Villegas

E.2 Filma Canales Sore

F.1 Manuel Antonio Bustos Huerta 和 Arturo Amador Martínez Molina

F.2 Roberto Oyarzo,Miriam Poblete,David López和其他人

四、智利政府报告的恐怖行动

102. 智利政府以 1989 年 3 月 3 日普通照会形式向特别报告员转交了一份自 1988 年 10 月 5 日以来该国所发生的恐怖分子袭击行动的报告。根据这份十分详细的报告,共有涉及爆炸物的破坏行为 199 起、涉及纵火的破坏行为 68 起和袭击行为 39 起。这些行动使 103 人受伤和 16 人死亡。死者名单如下:

- Luis Silva Jara
- Patricio Palma Navarrete
- Carlos Morales
- Juvenal Vargas Figueroa(警察)
- Cecilia Mañui Camino
- Raúl Alejandro Pellegrin Friedman

- Ernesto Patricio Renzo(Christian Contreras Jorquera)
- Pablo Vergara Toledo
- Araceli Romo Alvarez
- Samuel Soto Lillo
- Guillermo Rodríguez Solís
- Jaime Antonio Quilón Cabezas
- Salvador Fidel Cautivo Ahumada
- Juan Moya Bustamante
- José Juis Pizzoleo Canales(警察)
- Leonardo Marillanca Garate(警察)

103. 上述关于恐怖分子行为的报告现存档于日内瓦人权中心，可供大会各会员国查阅。

五、新的侵犯人权的指控

104. 本节所载资料是特别报告员从各有关方面、它们的律师以及智利各人权组织收到的法律文件汇编而成的。其内容涉及在1988年10月至1989年6月之间所发生的被指称侵犯人权行为。

105. 特别报告员以1989年10月5日致函智利外交部长的方式通过智利驻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大使转交了这些指控，同时表示了他对1988年10月至1989年6月之间在智利发生的被指控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

106. 和以往一样，该备忘录的基本目的是使一国政府对这些指控作出答复。但是，这不应被看作是特别报告员对这些指控的是非曲直有任何预先判断。

A. 生命权

A.1 Margarita Eliana Martín Martínez, María Paz Martín 和 Isidro Hernaán Salinas Martín.1989年1月16日, Aguirre Cerda 庭长上诉法院第二议事庭以杀害上述三人的罪名将属于特别行动小组的警察 Sergio Alberto Gajardo Ciadach 和 José Ricardo Luna García 交付审判。上述三人于1986年6月30日在圣地亚哥 Calle Mamina 街150号死于暴力。根据官方的说法,受害人为自杀。但是,弹道学专家的多份报告和其他证据能够说明关于上述两名警察以及被指称为同谋犯的失踪车辆局 Augusto Sobarzo 中校的有罪推断成立。

A.2 Enrique Abelardo Morago Muñoz.1989年2月7日,受害人的母亲向圣地亚哥第十八刑事法庭提交了一份有关杀人罪的投诉书。投诉书指出,受害人于1988年12月10日被警察 Ernesto Ibarra Conejeros 开枪打死。受害人的异父兄弟——一个名叫 Mariano Espinoza Muñoz 的未成年人目睹了这次凶杀事件。Mariano 被逮捕并被带至普恩特阿尔托监狱;此后他被交给军事检察院,后来又交给少年法庭,最后由于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据投诉人称,警察总局公布了一项公开声明,其大意是说 Ernesto Ibarra Conejeros 曾遭到一些反社会分子的袭击,这些人手持利刃和其他进攻性武器,袭击他是为了偷窃其衣服和贵重物品;该警察用他自己的左轮手枪进行自卫,致使一个袭击者死亡。

A.3 Guillermo Eugenio Rodríguez Solís.1989年1月17日,受害人的叔叔向圣地亚哥第二刑事法庭提交了一份关于杀人罪的投诉书。投诉人指出,正如国家情报中心的一份正式报告所确认的,1988年12月20日晚11时5分,在 Manuel Rodríguez 街369号附近,该中心人员开枪打死受害人。投诉人要求对这起凶杀事件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

A.4 Jaime Quilón Cabezas.1989年1月12日,受害人的父亲就一起谋杀

案向圣地亚哥第二十六刑事法庭提交了一份投诉。据投诉人称，1988年12月29日晚9时30分，受害人参加了悼念街道里死去的一名年轻居民的简短仪式。Teniente警察局的一群警察监视了这次悼念仪式。仪式结束后，受害人与其朋友Juan Ibañez Miranda一同离开。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尾随他们，然后向受害人开枪，两次击中其背部。受害人挣扎着呼救并得到街上几个人的照料，但是在救护车来到时，他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A.5 Jorge Germán Maldonado Velásquez.1989年1月30日，受害人的父亲向圣地亚哥第四军事检察院提交了一份关于不必要的暴力导致死亡的投诉书。据投诉人称，1989年1月21日凌晨约2时30分，其子在 Iván Eduardo Castillo Andreu 的陪同下去帮助一个正在遭到警察殴打的朋友。当他们到达现场时，警察向他们开火。Maldonado Velásquez 被击中，当即死亡。

B. 身心不容侵犯权

B.1 Ignacio Hernán Olivares Fernández, Aurelio González ,Carlos Luis Nuñez 和 Iván Anazco Astorga.一份关于警察 Héctor Vergara Sánchez 以及 Luis Vergara ,Hector Vergara 和 Julio Lizana 的人体伤害罪的投诉书提交给佩德罗阿吉雷切尔达第五刑事法庭。投诉书指出，1988年11月19日晨约5时，Carlos Araneda López 在离开一个朋友的婚礼晚会时遭到毒打。听到受害人呼喊后，另外两名客人——Iván Aedo Carmona 和 Ignacio Olivares Fernández 来到屋外。Olivares Fernández 的头部多次遭到猛击。在袭击者中，下列人员被认出：警察 Héctor Vergara、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孩子（他女儿——姓名不详——和他的两个儿子 Luis 和 Héctor vergara）以及他们中的一个朋友——Julio Lizana。该警察立即掏出武器并开始射击，致使 Aurelio González、carlos Luis Nuñez 和 Iván Anazco Astorga 受重伤。投诉人报告说，也是酩酊大醉的这同一警察在另一场合造成又一

人受伤，题为“诉 Héctor Vergara Fuentes”的相应投诉书已提交圣米格尔第五刑事法庭。

B.2 Mario Toro Astudillo 和 Hipólito Toro Valenzuela. 1989年2月21日，Toro Astudillo 的母亲和 Toro Valenzuela 的妻子向圣地亚哥第三军事检察院提交了一份关于不必要暴力致伤的投诉书。据投诉书称，Toro Astodilla 和 Toro Valenzuela 于 1989年1月18日下午1时被特别行动小组警察逮捕，这些人毒打了他们，在没有逮捕状的情况下逮捕了他们，并非法把他们带离其家。警察后来搜查了 Toro Valenzuela 的家并就指称藏在家中的武器盘问了其亲属。投诉人对 Mario 和 Hipólito Toro 的安全和身体不受伤害表示极为担心。

B.3 Francisco Cantillana Silva. 一份严重伤害罪的投诉书于 1989年1月22日提交给圣地亚哥第十一刑事法庭。据投诉书称，Cantillana Silva 被侦缉局一名人员从 Pañallolén 分部射出的子弹击伤。Samuel Mardones Arteaga 目睹了对投诉人的攻击。投诉人说，他受到严重伤害，30多天不能工作。

B.4 Leonardo Guillermo Silva Castillo. 一份关于武装部队成员、军士长 Rolando Manterola Sepúlveda 的不必要暴力罪的投诉书于 1989年1月2日提交圣地亚哥第一军事检察院。投诉书指出，1989年1月24日下午约6时45分，未成年人 Silva Castillo 停下来从大街上的一棵树上摘桃。当时还有一些孩子也在摘桃。正在同一条街上行走的军士长 Manterola 看到他们后便开始向他们喊叫并对他们进行侮辱。他还不满足，便向 Teniente Faberio 军事住房工程附近的酒店老板要了一支左轮手枪，对这群手无寸铁的孩子们连开数枪，击中了 Silva Castillo，使他受重伤。

B.5 Reinaldo Ricardo Moya Núñez. 一份关于不必要暴力造成严重伤害的投诉书于 1989年2月17日提交给第六军事检察院，对为该暴力行动负有责任的警察提出控告。投诉人指出，1989年1月28日夜1时30分左右，当他到达其妻

住宅时遭到袭击。他被一名警察开枪击中而受重伤。据 Moya Nuñez 称，他的伤势非常严重，数月后才能治愈，而且可能对今后的健康有影响。

B.6 Norman Hernán Gamboa Osorio 和 Claudio Héctor Gamboa Osorio.上述二人的祖母于 1989 年 1 月 31 日向圣地亚哥第十七刑事法庭提交了一份关于侦缉局人员 Victor Vera Varas 意图谋杀造成严重伤害和意图谋杀未造成伤害案的投诉书。投诉人称，Vera Varas 瞄准并开枪射击 Claudio Héctor Gamboa Osorio，未击中，然后继而从不足半米的距离处向站在其兄弟身旁的 Norman Gamboa 开枪，使其胃部中弹受伤。此后，Vera Varas 逃之夭夭。由于 Vera Varas 所射子弹造成的严重内伤，Norman Gamboa 不得不作了一次难度大的手术。

B.7 Juan Bautista 和 Luis Gatica Molina.一份关于非法逮捕、非法胁迫、不必要暴力和人体伤害的投诉书于 1989 年 2 月 6 日提交圣地亚哥第五军事检察院。投诉人指出，警察对他和他兄弟施加不必要的暴力以及后来又无根据和非法地逮捕他们。据投诉书称，在该两兄弟无端地被用警棍不断猛击和用脚踢的时候，特别部队的这些成员却欣喜若狂。

B.8 Helga Blumenberg Alfonso.在她自己于 1989 年 2 月 17 日向阿里卡第四刑事法庭提交的刑事投诉书中，她坚持说，在 1989 年 2 月 6 日晚 9 时 30 分，她被一伙不能确定身份的人拦住，这些人殴打并劫持了她。后来，她受到审讯，由于她拒绝合作因而被重打。这次劫持达 7 天之久，在此期间她受到审讯并得不到任何食物。她还受到心理上的威胁。1989 年 2 月 13 日凌晨 3 时，她被丢弃在兰卡瓜棚户区。投诉书指出，警察拒不将她送往急救站。投诉人说她对她的安全表示担忧。

B.9 Raúl Mario Valdebenito Sepúlveda.一份关于不必要暴力造成伤害罪的投诉书于 1989 年 2 月 24 日提交圣地亚哥第一军事检察院，控告对这起暴力行为负责的警察。投诉人肯定地说他亲眼见到警察逮捕了一名女小贩。该妇女受到了极

端暴力对待。他被命令继续走他的路，他议论了一句，结果被一名警察听到。他便遭到几个警察的殴打。随后，他被带到警察局，后获保释。据投诉书称，对此事负责的是一名佩带第 4821 号警徽的警察和另外四名警察，他们帮助该警察殴打投诉人。

B.10 Miguel Angel Vera Villanueva 和 Juan Carlos Pérez Toledo 一份有关不必要暴力造成伤害罪的投诉书于 1989 年 5 月 4 日提交第二军事检察院。投诉书称，1989 年 3 月 12 日，Vera Villanueva 目睹了一起看起来是打斗或袭击的事件，其中 Pérez Toledo 和 Rafael Adasme Valenzuela 两人正遭殴打。Vera Villanueva 也被一名持械便衣毒打，直到载有数名警察的警车开来；这些警察立即继续对他进行殴打。Vera Villanueva 和 Pérez Toledo 被逮捕并被带到圣拉斐尔棚户区的第四十一警察局，在那里，在他们的戴着手铐的情况下又遭到长时间殴打。

B.11 Manuel Fernando Rivera Irrazabal 受害人的父亲于 1989 年 4 月 12 日向圣地亚哥第十一刑事法庭提交了一份刑事投诉书。投诉书指出，1989 年 3 月 18 日，Rivera Irrazabal 参加一次聚会。在大约中午 12 时，他与 Héctor Silva Apablaza 和 Cristián Ramos Olivares 一起离开正在举行聚会的房屋，打算到一个附近的店铺买些饮料，然后去接一名朋友——Alexis Reyes Hernández，当他们到达后者家中时，该朋友的父亲告诉他们说，他儿子不去参加聚会了，当时他在喝醉酒的情况下带了一把刀子跑到街上，攻击了一个未成年人 Jorge Luis Fernandes Olivares。Rivera Irrazabal、Silva Apablaza 和 Ramos Olivares 力图通过向那位父亲投掷石块的方法来保护他们自己。正在这时，一辆警车停下来，大约四名警察从车上下来并开始向这些青年射击。其中有一枪击中 Rivera Irrazabal。即使他受了伤，他还是被拽着头发拉了 30-40 米远。

B.12 Juvenal Angelo Mellado Labarga 一份请求预防性保护书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该请求书指出，当请求人于 1989 年 3 月 30 日在 Lo Valledor 市场

上时，突然，两名路过的便衣以十分专横和非法的方式逮捕了他，指责他是小偷。请求人遭到粗暴地搜身。据请求书称，他当时携带有关智利工人运动历史的一些录像带和一盘关于科幻故事的录像带。然后，他们便指责他是“鼓动颠覆分子”并对他进行威胁。他被带到在该市场活动的保安人员占据的地点，在那里，在就其活动和录像带来源受到连续不断的审问的同时，他遭到拳打脚踢。请求人在那里被押了一小时，一直受到骚扰，和办理了各种非法手续。后来他被带到阿塞玛丽亚卡罗棚户区第十一警察局，在那里他又受到殴打和审讯。约在下午6时，他被一名警察释放，据请求书称，该警察威胁说要继续对其活动进行监视。

B.13 Francisco Manuel López Fuentes 和 Eduardo Antonio López Fuentes. 一份请求保护书于1989年4月18日提交佩德罗阿吉雷切尔达上诉法院。请求人指出，López Fuentes 兄弟于1989年4月17日星期一凌晨2时许在他们各自的家中被侦缉局人员逮捕，这些人未说明他们的身份也未出示授权他们这样做的任何令状即闯入他们家中。这两兄弟的家，即其母 Norma Fuentes Martínez 的家以及请求人的家均遭到搜查。据请求书称，这两兄弟、请求人和 Eduardo López 的同伴遭到逮捕并被带到圣贝尔纳多第十六司法侦缉局，在那里他们受到审讯。请求人指出，在该局时她看到 Francisco López 的脸部被用软管抽打，Eduardo 也遭警察殴打。

B.14 Pedro Patricio Rojas Uribe. 一份请求保护书于1989年4月19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据请求书称，Rojas Uribe 于1989年4月17日午夜12时许进入家中时被警察逮捕。他受到野蛮殴打后被带到洛贝拉斯克斯警察局。此后他被转移到伦卡第七警察局。他的父亲得到通知说，他儿子因为刷写支持1989年4月18日罢工的标语已经被捕。他还得到通知说，另一名男子——José Garay 也因与此有牵连而被捕。Rojas Uribe 由于受到殴打，其右大腿和一条小腿受伤。他还指控说他曾一再被侮辱。

B.15 Cristian Marcelo Arcos Hernández 和 Raúl Antonio Arcos Hernández. 一份对为不必要暴力罪负责的军事人员的投诉书于 1989 年 5 月 4 日提交圣地亚哥第五军事检察院。据投诉书称, 1989 年 4 月 18 日上午约 10 时 20 分, Arcos Hernández 兄弟被警察用脚踢和用棍子打。这次殴打使得受害人特别是在背部和胸部感到剧烈疼痛。

B.16 Marta Isabel Vergara Vergara. 一份人体伤害罪的刑事投诉书于 1989 年 5 月 8 日提交圣地亚哥第十八刑事法庭。据投诉书称, 1989 年 4 月 18 日, Marta Isabel Vergara 在回家的路人偶然遇到游行队伍, 她被击中臂部。她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帮助。据投诉书称, 她的伤势严重。

B.17 María Cecilia Cuevas Loyola. 一份有关严重伤害罪的刑事投诉书于 1989 年 6 月 8 日提交圣地亚哥第十刑事法庭。据投诉人的父亲叙述, 1989 年 4 月 18 日, Maria Cecilia 在她家门前正与一伙朋友交谈。她父亲看到一辆吉普车上站着一个人戴头盔的人, 然后他听到一声枪响。这一枪击中 María Cecilia, 造成她腹部严重受伤。受害人已接受了三次手术, 还必须接受第四次手术。

B.18 Ivan Alejandro Arias Villa. 一份关于不必要暴力造成严重伤害罪的投诉书于 1989 年 5 月提交第一军事检察院 (第 617-89 号案件)。据投诉书称, 在 Cecilio López、Orlando Alfaro、Adolfo Carrasco 以及 Orlando Alfonso Flores 的陪同下, Arias Villa 于 1989 年 4 月 31 日清早外出打猎。Arias Villa 和他的同伙停了一会儿, 当他们再开始行进时, 他觉得腿疼并意识到在驾驶汽车时受了枪伤。他们靠近一辆载有军事人员的轻型卡车, 请求帮助, 但是士兵们却粗暴地作出反应并搜查了他们的物品。击中受害人的士兵离他们有一定的距离, 而且据投诉书称, 他象疯子一样继续射击。

B.19 Manuel Antonio Arriagada Canales. 一份有关侦缉局人员 (其中之一是名叫 Briones 的男子) 的刑事投诉书于 1989 年 5 月 12 日提交圣地亚哥第二十

三刑事法庭。据投诉书称，投诉人于 1989 年 5 月 8 日被 Briones 警官逮捕并带到警察局。他受到多次审讯和一次毒打，他的太阳穴和左睾丸遭电刑。他在警察局看到的另外一名警官是 Raúl Villalón 巡官。由于不能证实对受害人的指控，5 月 9 日将其释放。

B.20 Patricio Enrique Chávez Cubillos 和 Orfilia de las Mercedes Cubillos Miranda.一份请求保护书于 5 月 12 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据请求书称，请求书主体——Chávez Cubillos 于 1989 年 5 月 10 日晚 8 时 30 分左右被梅里诺中尉镇警察局的警察殴打和逮捕。对他的逮捕是粗暴的，尽管他没有说过也没有做过任何使这一逮捕有根据的事情。他被多名警察拳打脚踢和棍棒的猛打。请求人说，她也遭到警察下士 Patricio Geldres 的殴打。他殴打她，并未考虑他的行为是非法的这一事实。然后，他们被带到警察局，在那里 Chávez Cubillos 又遭到殴打，特别是后背下部。据请求书称，他被指控袭击警察而转送至圣地亚哥教养所。

B.21 Carlos Amado Rodríguez Aguilera.一份关于警官施加不必要暴力造成严重伤害的投诉书于 1989 年 5 月 22 日提交圣地亚哥第四军事检察院。据投诉书称，1989 年 5 月 13 日晚约 8 时 30 分，投诉人走过一辆汽车，有三名便衣警察从车上下来。他们既不出示也不查看任何证件，显然没有任何理由地开始用一部冲锋枪殴打 Rodríguez Aguilera。受害人全身遭到殴打，并被在地上拖来拖去。他被带到洛利略警察局，后被释放。受害人的母亲——Esmerita Aguilera Leiva 太太以及三个邻居——Patricio Contreras Navarro、Rolando Niño González 和 Mauricio Vásquez Ambul 也遭到警察殴打。Manuel Opazo Albornoz、Juan Durán Pincheira 和 Luis Rodríguez Castro 与受害人一起被捕，后亦被释放。

B.22 Claudio Alberto Torrealba Torrealba.一份有关警察——其中之一名叫 Juan Flores——的投诉书于 1989 年 5 月 25 日提交圣地亚哥第五军事检察院。据投诉书称，1989 年 5 月 18 日夜 12 时 30 分左右，未成年人 Torrealba Torrealba

在阿塞玛丽亚卡罗棚户区集市上摆了一个货摊。巡逻警察无端地野蛮殴打他。随后，他们将他逮捕并把他带到第十一警察局。据投诉书称，他受到了非法胁迫，其中包括对其生殖器施电刑和痛打其身体许多部分。

B.23 Robinson Javier Barria Mena.一份关于位于卡德纳尔-卡罗的罗埃斯佩霍第十一警察局工作人员施加不必要暴力造成伤害的投诉书于1989年6月28日提交圣地亚哥第五军事检察院。据投诉书称，1989年6月17日星期六午夜12时左右，Barria Mena在街上与某人发生争执。两个穿便衣的人来到现场，也不表明他们的身份就抓住Barria Mena的肩膀。Barria Mena设法挣脱后逃回家中，但过了一会，那两个人中的一人与警察一起乘坐一辆中型汽车也赶到他家。他被带到第十一警察局，在那里他遭到穿便衣的男子的毒打和粗暴对待。他们当中一个人用香烟烧他的胸部。1989年6月18日，他被传唤到拉西斯特纳地方治安法庭出庭后被释放。

B.24 Manuel Jesús Córdova Pávez.一份有关侦缉局人员的投诉书于1989年6月26日提交圣地亚哥第七刑事法庭。据投诉书称，1989年6月20日晚11时左右，Córdova pávez和他的朋友Rodolfo López一起驾驶车辆时被三、四部侦缉局车辆拦截。警察命令他们下车，同时叫喊他们是极端分子。据投诉人称，在没有要求查看任何证件的情况下，数名警察即围住他并开始用拳头和钝器野蛮地殴打他。López Segura也遭到殴打和类似的粗暴对待。然后，他们被带到亚历山德里警察局。次日，投诉人被转移到亚巴尔上尉镇监狱，又从那里转至第七刑事法庭，后获保释。

C. 自由权

C.1 Cristian Saba Valenzuela 和 Mauricio Díaz Pena.由 Cristian Saba Valenzuela 的父亲、Miguel Angel Saba Ruiz 先生代表他们于1989年1月21日

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请求保护书指出，他们由于被指控犯有袭击和持械抢劫罪于1989年1月19日下午5时被捕。由于Cristian Saba Valenzuela是个未成年人，因此他应被转至第三十四警察局而不是一个不知名的地点，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尚未被转到教养所。

C.2 Martín Rodrigo Quevedo Godoy由 Marcela Mansilla Potocnjak 夫人于1989年1月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请求保护书指出，Quevedo Godoy与Ricardo Gólez和Julio Díaz一起于1989年1月21日被捕，他目前被关押在第十二警察局。Mansilla Potocnjak获悉，她的同居者将被交由圣地亚哥第二军事法庭的一个检察官办事处审理。到目前为止，她尚未得到她的同居者为什么被拘留或者对他有什么指控的通知。Quevedo Godoy现被剥夺了自由权，并被关押在上述警察局。

C.3 Rene Alfredo Lazo Sanhueza据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请求保护书称，由于被指控参与袭击了一蒸气浴室，他于1989年3月8日在Huérfanos街和Maclver街交叉路口被逮捕。请求书指出，尽管警察特别行动小组知道这次逮捕，但没有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该小组未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将他交由法院处理，据认为他现被押在第一警察局。

C.4 Claudio Andrés Tapia Orellana 和 Palolo Ardrés Parada Apablaza 1989年6月6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请求保护书指出，他们是被警察局的便衣人员逮捕的。他们被转到拉斯特兰克拉斯第十七警察局，后于1989年4月19日又被转到圣地亚哥教养所。

C.5 Roberto Antonio Muñoz Albuerno 1989年4月24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请求保护书指出，他是在返回智利居住时于1989年4月23日在帕索-洛斯将军区镇被警察逮捕的。侦缉局说，他并不是由于他们提出的原因而被捕的。而是由于与被指称的进口被禁印刷品有关而交由洛斯安第斯市海关部门处理

的。侦缉局否认他已被捕。海关署署长说，他没有任何关于这一案件的消息。

C.6 José Luis Villanueva Vinett.据 1989 年 4 月 26 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请求保护书称，他于 1989 年 4 月 26 日上午 11 时 45 分左右在街上被便衣警察逮捕，这些人说他们是侦缉局的。一伙人曾去侦缉局中心兵营，但被告知他在第三军事检察院。请求书指出，Villanueva 是被非法逮捕的，因为未向他出示任何逮捕状，他也是被擅自逮捕的，因为他没有犯过任何可以使警察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的违法行为。

C.7 Carlos Alejandro Jara Jara.1989 年 5 月 19 日提交 Aguirre Cerda 庭长上诉法院的一份请求保护书指出，1989 年 5 月 18 日下午 6 时许，警察、便衣警察和士兵在未曾出示主管当局的任何令状的情况下闯入他家。然后他即被逮捕，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将被押往何处。

C.8 Veronica Morales.1989 年 6 月 8 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请求保护书指出，1989 年 6 月 8 日晚 12 时 30 分左右，当她站在智利银行主要分行外边时，有一大群皮诺切特将军的支持者向她走来，怂恿她参加亲皮诺切特的示威游行。在她不愿意这样做并对皮诺切特将军表示不怎么支持时，她遭到殴打，直到警察干预，使她免受重伤。然后她被警察逮捕。据请求书称，无人知道警察把她带往何处。

C.9 Roberto d 'Orival Briceño, Macarena Vivanco Figueroa, Rosario Puga Mowller 和 Mónica Naveillan.据于 1989 年 6 月 17 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请求保护书称，约 50 名出于政治原因被处决的人的亲属以及参加捍卫和促进人权的人士在拉莫内达官对面的 Alameda 中心保留地上集会，举行一次为违法行为受害者申张正义和表示反对不受惩罚和赦免法的和平示威。当这次据请求书称持续了四分钟的示威活动就要结束时，大批警察赶到，尽管示威者在口头或行动上没有暴力行为，他们还是逮捕了上述四人。

C.10 Amalo Bravo Contreras , Eric Amador Bravo Barria 和 Barrera Munoz 据 Inés Barria Silva 于 1989 年 6 月 22 日提交 Aguirre Cerda 庭长上诉法院的一份请求保护书称, 1989 年 6 月 21 日上午 11 时 30 分, Barrera Muñoz 正在他的作坊里工作, 这时一名巡警来到该作坊并要求看他的证件。Barrera 抱歉说他正在工作。该警察因此而生气并开始野蛮地殴打他的睾丸和胃部。请求书指出, Amado Bravo 和 Eric Bravo 听到他的叫喊声即赶来防护他, 也遭殴打和辱骂。他们均被逮捕并被带到圣拉蒙警察局。

C.11 Nelson Lozano Zuñiga 和 Héctor Gómez Hevia 据于 1989 年 6 月 23 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请求保护书称, 他们在 1989 年 6 月 23 日下午 1 时 40 分左右被圣地亚哥特警部队逮捕, 当时他们正在参加一次抗议圣地亚哥多年来存在的而且现已严重威胁居民生活的环境污染的活动。他们被转到圣地亚哥第一警察局。记者 Jaime Cavada Alcaide 也在这次抗议活动中被捕, 后被释放。

D. 安全权

D.1 Edgardo Rojas Toro 据于 1989 年 5 月 22 日提交圣地亚哥军事上诉法院的一份请求保护书称, Rojas Toro 于 1987 年 12 月 14 日在塔尔卡瓦诺被捕。他现被拘禁在圣地亚哥政府监狱东 7-8 号囚区。在他被拘禁的整个过程中, 他受到了极端粗野和侮辱人格的对待。据请求书称, 他从未被与同类囚犯——政治犯或与犯有颠覆罪的囚犯关在一起, 这一事实构成了不正当的歧视, 使他处于实际上隔离的状况, 因而使他在监狱的囚禁更加痛苦和难以忍受。

D.2 Nelson Darío Suazo Melo 代表他于 1989 年 1 月 31 日提交佩德罗阿吉雷切尔达上诉法院的请求保护书指出, 他于 1989 年 1 月 30 日下午 4 时被一伙既没有表明其身份也没有出示任何令状的平民逮捕。他在 1989 年 2 月 7 日被释放。Nelson Darío Suazo Melo 说, 他不知道是谁逮捕他的, 但是他们是平民而不

是警察。他被问及他作为成员之一的共产党下一届大会将在何地举行，并遭到殴打和威胁。请求人要求保护诉讼继续有效，因为她担心 Nelson Darío 的安全。

D.3 Manuel Humberto Catalán Prado 据于 1989 年 2 月 6 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请求保护书称，请求人现任因德彭登西亚区民主党区主席。在党总部他曾发现一个信封中装有一封恐吓他的信件如下：“Lito，你的末日已到，你将会死掉”。该信是以民族解放的标识语签署的，这是一个有名的极右翼恐怖集团，其领导和政治活动也是广为人知的。

D.4 Datricia Eugenia Vidaurrízaga , Claudia Lister Vidaurrízaga , Mark Lister Vidaurrízaga 和 Michael Lister Vidanrrízaga 据于 1989 年 2 月 13 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请求保护书称，1989 年 2 月 6、8 和 9 日，他们的家遭到警察的突然搜查。Patricia Eugenia Vidaurrízaga 还指出，他们一直受到恐吓和威胁，并曾多次在凌晨收到匿名电话。

D.5 José Orlando Prádenas Paredes 于 1989 年 2 月 27 日提交圣地亚哥第三军事检察院的一份投诉书指出，Prádenas Paredes 的家于 1989 年 2 月 8 日下午 1 时 30 分遭到警察的搜查。当时没有人在家。据 Porádenas Paredes 称，警察毁坏了一些个人财物。他对他的自由以及他家人的自由感到担心。一份代表 José Orlando Prádenas Paredes、Mariá Catalán Aguero、Camilo Prádenas Catalán 和 Salvador Prádenas Catalán 等人的请求保护书也于 1989 年 2 月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

D.6 Julia Elisa González Acuña , Gersusvaldo Morales Silva , Manuel Benito Soto Soto 据于 1989 年 2 月 9 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及早请求保护书称，他们的家遭到了警察的突然搜查。这是一次非法和擅自的突然搜查，因为警察并没有出示主管法院授权他们进行搜查的令状。据请求书称，这次突然搜查更带有军事行动的性质，因为为了搜查请求保护诉讼主体的住宅以及 La Bandera

区独立工人工会总部对整个街区联合部署了大约 300 名警察和便衣警察。请求书坚持认为，上述行动违反了宪法对住宅不受侵犯的保证。请求保护宪法权利诉讼主体对他们的人身自由表示担忧。

D.7 Julio Solís Maraboli, José Jofre González, Luis Lizana Gallardo, Eduardo Tapia Guamán, Pedro Castillo Bustamante 和 Victor Valderrama Rebolledo. 1989 年 3 月 15 日，代表上述人员以及智利残疾手工艺者互助公司全体成员的一份请求保护书提交圣地亚哥上述法院。据请求书称，销售互助公司生产的手工艺品所必要的执照和许可证未能展期。不让展期的决定是 1989 年 2 月 27 日作出并由市长办公室宣布的。该公司抗议说，这项决定使得他们不能合法地从事法律允许的商业活动。

D.8 Horacio Blanco Pavez 和 Cristobal Blanco Pavez. 据 1989 年 3 月 21 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请求保护书称，他们在 1989 年 3 月 8 日接到通知说智利天主教大学校长决定不准他们入学。他们的父亲于 1989 年 3 月 13 日曾到该大学院办打听作出这项决定的理由。他是由主管行政和经费的主任 Juan Luis Correa 接待的，据请求书称，该主任解释说，这两个年轻人所以不能到该校上学是因为“他们有政治行动主义的历史”。据请求书称，Correa 所提到的政治行动主义可能就是从该兄弟俩曾被一个海军检察官院调查过这一事实推断而来的。

D.9 Jorge Patricio Córdamo Castro 和 Pedro Danny Weibel Navarrete. 据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及早请求保护书称，1989 年 3 月 15 日，《最后消息报晚刊》报道说，该政府部长掌握一些背景材料，可直接控告他们犯有被指称的放毒于给智利出口葡萄从而给智利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的罪行。据请求书称，把这一据称的放毒罪名归咎于请求保护书主体是为了再次提出捏造的“水果计划”，为此他们已在第 596-86 号案件中受瓦尔帕莱索军事检察院的审问。那次，被告声称他们曾受到野蛮的酷刑。Córdamo Castro 曾被迫在摄影机前宣读致共产党的一封信，

要求共产党放弃民众造反的政策，还被迫宣读只是到最后时刻才交给他的一些打字稿件，这些稿件提到了一项被指称的破坏水果装运以及甚至——据某些段落称——放毒于水果的计划。据请求书称，关于放毒于智利葡萄的伪造指控使该二人处于人身自由受到威胁的境地。

D.10 Ema Hortensia Molina Martínez 和 Mario Bastias Morales , Alex Fabián Bastias Molina , Roberto Mario Bastias Molina , Francisco Eduardo Bastias Molina 和 José Molina Martínez.据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及早请求保护书称，1989年3月22日，当 Alex Fabián Bastias Molina 独自在家时，一些武装人员进入他的住宅。他被问及该楼的住户情况。他的住宅被一些人员搜查，他们还用枪托殴打 Alex Fabian 。据请求书称，诉讼主体对他们的人身自由表示担忧。

D.11 Eliana Vilches Santelices.据1989年3月31日提交给 Aguirre Cerda 庭长上诉法院的一份及早请求保护书称，1989年3月29日晚11时左右，一伙侦缉局人员突然搜查了她的住宅。她孙女的男朋友、学生 Aldo Ronald González Meneses 被逮捕，他被指控违反军火和爆炸物管制法。据请求书称，她的住宅曾在1989年3月30日下午6时至晚10时受到监视。她担心这种监视可能会持续下去，也担心她的住宅可能会再次遭到突然搜查。

D.12 Luis Ernesto Tricot Novoa , Rocío Reyes Abovich 和 Takuri Tricot Reyes.据于1989年4月3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及早请求保护书称，1989年3月23日晚9时许，请求人和他儿子被人跟踪。他的住宅在1989年3月31日受到监视，他和他的家人再次被人跟踪。他解释说，1988年11月，他被第二军事检察院——他由于违反军火和爆炸物管制法而在那里等候审判——释放候审。他在被拘留期间曾一再受到审问和酷刑，特别是受电刑，脊骨严重受伤。他说他现在一直受到跟踪。

D.13 Carlos Dupré Silva, Verónica Bueno Rivas, Ximena Dupré Bueno, Marcela, Dupré Bueno 和 Javier Dupré Bueno 据于 1989 年 4 月 10 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请求保护书称, Carlos Dupré Silva 是一位政治领导人并任基督教民主党的全国顾问。据请求书称, Bueno Rivas 夫人在 1989 年 4 月 2 日下午 5 时左右接到了下面这样一个匿名电话:“这是民族解放在打电话, 我们警告你, 你的全家人都将失踪”。五分钟后她接到第二个电话:“这是民族解放在打电话, 我们警告你, 你们全家必须离开这个国家……不然, 全家都要上西天了……将给你们打五次电话, 然后我们就将采取行动”。Bueno Rivas 夫人说, 她在 1989 年 4 月 8 日接到两次电话, 也就是第四次警告他们会死去。她担心家里有人可能会受到某些严重或无可挽回的事态的影响。

D.14 Carlos Alfonso Alvarez Molina, Inés Tapia Riquelme, Yuri Andrés Alvarez Tapia 和 Carolina Andrea Alvarez Tapia 据于 1989 年 4 月 24 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及早请求保护书称, 1989 年 4 月 23 日晚 8 时 30 分左右, 一辆中型警车开到 Alvarez Molina 的家。一个警察告诉他说, 他已被一群目击者指控企图在 4 月 18 日总罢工的那一天安放一颗炸弹。Alvarez Molina 说, 警察根本没有出示授权调查和审问他的任何令状; 他也没有被主管法院或任何警察部门传讯。

D.15 Llamil Hussein Belmar Vilches 据于 1989 年 6 月 6 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请求保护书称, 在 1989 年 6 月初, 西班牙-智利中学的一伙年轻学生被发现在校内刷写标语。其中一人——Belmar Vilches 也是学生组织“民主委员会”的成员。据请求书称, 警察带有恐吓 Belmar Vilches 的明显企图, 就其某些同学的活动以及一伙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对他进行了盘问, 命令他在继续作为民主委员会成员的同时加入社会党。

D.16 María Soledad Nielbalski Ajagan 据于 1989 年 5 月 10 日提交圣地亚

哥军事上诉法院的一份纪律申诉书称，自 1989 年 5 月 4 日以来，Nielbalski Ajagan 夫人在监狱院内一直受到完全隔离的拘禁。她不能接受她的律师或者她丈夫、家人、教士等的探监。还不允许她收到信件。在此之前（1989 年 4 月 10 日），代表她的一份请求保护书已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第 772-89 号案件）。一份关于军事上诉法院未能保护她不受目前非法拘禁的裁决的投诉书也于 1989 年 5 月 8 日提交最高法院。

D.17 Roberto Iko Andaur Rodríguez, Ivar León 和 Victor Fernández Febres. 1988 年 7 月，Andaur Rodríguez 证实他曾在 1988 年 5 月 5 日被国家情报中心人员逮捕。在逮捕他的过程中，一个特工人员开枪击中他的胃部和左腿。他还受到脚踢。他被送到海军医院，在那里他受到了肉体和心理上的折磨。他在该医院一直呆到 5 月 26 日才被宪兵转至瓦尔帕莱索监狱。在监狱中他现被单独监禁在一个专门的院子里。上述三人在 1989 年提交瓦尔帕莱索海军检察院的一份书面作证中要求在圣安东尼奥监狱 Ivar León León 一案、基约塔监狱 Víctor Fernández Febres 一案以及瓦尔帕莱索监狱 Roberto Iko Andaur Rodríguez 一案中取消禁止探监和实施单独监禁的措施。

D.18 Julio Máximo Aranguiz Romero, Jenny Nora Sherman Files, David Esteban Araaguiz Schermann 和 Tatiana Rocio Aranguiz schermann. 据 1989 年 5 月 9 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及早请求保护书称，Aranguiz Romero 目前保释在外，等候康塞普西翁第二军事检察院的审判。他于 1988 年 1 月 26 日获释。据请求书称，他在 1989 年 4 月 4、5 和 20 日被许多便衣监视和跟踪。5 月 5 日和 8 日，他被一辆苔绿色、型号为 J10GL、登记牌号为 AU46 87 的 Subaru 牌汽车上的人员监视和追踪。他对他的入身自由，他妻子以及孩子们的入身自由感到担心。

D.19 María Leontina Solis Delgado 和 Armando Vásquez Solis. 一份及早请

求保护书于 1989 年 5 月 19 日提交 Aguirre Cerda 庭长上诉法院。请求书指出，1989 年 5 月 18 日下午 4 时许，两个人来到 Solis Delgado 的家。他们乘坐的是侦缉局的一辆公车，他们说他们是侦缉局的。Solis Delgado 说，他们把她家彻底查看了一遍并问及邻居家的情况以及那家的年轻人是否属于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据请求书称，她拒绝合作，因此他们威胁说下个星期再来询问更多情况。

D.20 Liliana del Carmen Montenegro Rebolledo.1989 年 5 月 19 日，一份及早请求保护书提交 Aguirre Cerda 庭长上诉法院。请求书指出，1989 年 5 月 18 日下午 3 时左右，约有七名警察和一名平民等一伙人来到 Montenegro Rebolledo 的家并就她的情况盘问了她的母亲。警察说他们曾收到了一个“匿名电话”，声称可以在极端分子 Montenegro Rebolledo 的家中找到一辆袭击警察所用过的中型汽车。Montenegro Rebolledo 说她已受到现与之分居的丈夫、Francisco Basaure Herrera 的威胁。她认为，她所报告的情况可能与其丈夫的威胁有联系。

D.21 Luis Alfonso Muñoz Rojas.1989 年 5 月 19 日，一份及早请求保护书提交 Aguirre Cerda 庭长上诉法院。请求书指出，1989 年 5 月 18 日晚 7 时，人数不详的一批警察和便衣闯入 Muñoz Rojas 的家。在对该住宅进行搜查和就家庭情况对他的儿子进行盘问之后，他们将 Muñoz Rojas 逮捕并把他带到位于 Santa Rosa 大街 18 路汽车站旁的拉卡斯特里纳警察局。在那里，他被审问了关于智利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的情况，他曾被邀参加了这次大会。

D.22 Juan Ramón Díaz Espinoza.1989 年 6 月 6 日，一份请求保护书提交佩德罗阿吉雷切尔达上诉法院。请求书指出，1989 年 6 月 2 日下午 1 时左右，两名武装人员命令 Díaz Espinoza 下了公共汽车。他们把他带到一辆小汽车旁，并把他推倒在地，拳打脚踢。他们反复问及他的活动以其家人的活动，更具体地说，问他是否参加了什么政党的活动，然后便把他放了。他说，自那次后他一直受到跟

踪。

D.23 Manuel Humberto Valencia Acuña , Eliana Calderón Veliz , Claudio Sánchez Henriquez , Patricia Eugenia Valencia Calderón 和 Eliana Ivonne Valencia Calderon .1989年6月16日,一份及早请求保护书提交佩德罗阿吉雷切尔达上诉法院。请求书指出,1989年6月15日中午12时左右,一队20名警察来到请求人的住宅,问及那里是否有一部偷来的蓝色小汽车。然后,警察问了他们关于 Manuel Eduardo Valenzuela Calderón 死亡的情况,该人是在“阿尔巴尼亚行动”中被杀的。后来警察们乘坐一辆牌号为 R.P.-381 的无线电巡逻车离开该住宅,请求人担心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可能会遭到非法逮捕。

D.24 Mónica Gonzá Mujica , Rodrigo González López 和 Margarita Estrada .于1989年6月16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请求保护书指出,他们一直受到跟踪并多次接到身份不明者的匿名电话和不断威胁。González Mujica 在请求书中说,她认为这些事件是由于最近数星期来她在《分析》周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引起的,她在文章中介绍了国家情报局这个众所周知的组织的各个方面,也是由于她刊登在加拉加斯《国民日报》上、后又刊登在《河道》杂志第32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这篇文章涉及到 Roberto Fuentes Morrison (联合指挥部的一名成员和前智利空军成员,现已死亡)及其所起作用。请求人担心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身心会受到骚扰。

D.25 Heriberto Mena Bastias 和另外 30 名“政治犯”.1989年7月26日,一份及早请求保护书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据该请求书称,上述所有犯人均均为被囚禁在圣地亚哥城北防护关押中心(原为政府监狱)中的“政治犯”。根据请求书中所陈述事实,由于其安全以及身心经常受到威胁,犯人现请求保护。在1989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名军事检察官来到这座原政府监狱并视察了关押“政治犯”的各个囚区。在7月的第二个星期,对该监狱各建筑物进行了搜查,并对犯人的物品

采取了不同寻常的、费解的非法暴力措施，造成一些监房不同程度的损坏，甚至一些物品丢失。据请求书称，这次搜查是由并不在这一监禁设施内工作的宪兵队的宪兵进行的。此外，还对 15 名“政治犯”暂停探监，但未将这一措施通知他们本人。

D.26 Juan Cuadrado Katusich 她于 1989 年 8 月 7 日向瓦尔帕莱索第三刑事法庭提交了一份关于威胁和非法结社的投诉书。投诉书指出，1989 年 7 月 2 日下午 3 时 45 分左右，投诉人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男子的声音说：“我可以与 Juana Cuadrado 讲话吗？告诉她她还能活六个星期了。”更为严重的是它涉及到一些非法团伙的存在，这些团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对捍卫人民权利委员会——投诉人即属该委员会——的成员进行威胁。前些时候她曾以同样理由于 1989 年 7 月 4 日向同一上诉法院提交了一份及早请求保护书。

E. 获得正当审判和诉讼程序保证的权利

E.1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 一份有关军事检察官 Sergio Cea Cienfuegos 的纪律。投诉书（智利最高法院第 PR5161 号案件）于 1989 年 1 月 13 日提出。投诉书批评了 Sergio Cea Cienfuegos 的司法行为，因为他在第 782-86 号案件中发布了一项决定，下令没收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 综合医院的医疗记录以及对一个宗教场所进行检查和搜查。投诉人认为这一决定是“特别军事检察官的一种滥用权力和武断行为”。以袭击 Lautaro 面包店和杀害警察 Miguel Vásquez Tobar 为由控告 Germán Alfaro Rojas 的第 782-86 号案件正在继续审理之中。这一案件中的被告包括 Gustavo Villalabos Sepulveda 律师和 Ramiro Olivares Sanhueza 医生，他们是被控违反第 17, 798 号军火和爆炸物管制法第 8 条的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 的官员。

E.2 Ramón Rojas Beltran 最高法院检察官于 1989 年 1 月 19 日公布了一项裁决，确认引渡 Rojas Beltran 的要求。这项裁决指出，Rojas Beltran 目前居住在

乌拉圭，他因违反第 17, 798 号军火和爆炸物管制法第 8 条（组织或帮助建立和管理私人民兵）而必须受到审判。已请求乌拉圭政府引渡他回智利。

E.3 Cristian Alfonso Vargas Barahona 和 Juan Ramón Olea. 1989 年 2 月 7 日，圣地亚哥军事法庭宣判他们犯有袭击拉西斯纳特第十警察局并杀死两名警察的罪行。Cristian Alfonso Vargas Barahona 和 Juan Ramón Diaz Olea 被判处死刑。据他们的律师称，军事法官认定的这些罪名是以在严刑拷打之下逼出的口供为根据的。他们补充说，这两个人是无辜的，因为在发生他们被指控的那些行为时他们不在场。

E.4 Lautaro Cruz Sandoval, Osvaldo Quezada 和 Héctor Figueroa Gómez. 据 1989 年 2 月 17 日提交圣地亚哥第二军事法庭的一份书面材料（第 1919-86 号案件）称，对他们袭击总统护送队而提出的诉讼已秘密进行了 28 个月。军法第 130 条规定，审判前诉讼程序不得超过 40 天。根据这一法令规定，这个时限已超过了 22 倍还多。

E.5 Rodrigo Andres Rojas de Negri 和 Carmen Gloria Quintana Arancibia. 负责调查 Pedro Fernández Dittus 对上述人士所犯杀人和严重人体伤害等准不法行为的特别军事检察官于 1988 年 12 月 22 日宣布了一项裁决，判处 Pedro Enrique Fernández Dittus 最低监禁 300 天，还要承担于 1986 年 7 月 2 日在圣地亚哥市分别对 Rodrigo Rojas de Negri 和 Carmen Quintana Arancibia 所犯杀人和严重人体伤害等准不法行为造成的法律后果。据这项裁决称，头部、颈部、躯干和四肢的二度和三度烫伤致使 Rojas de Negri 于 1986 年 7 月 6 日下午 3 时 50 分在中心诊所特护室死亡。同日，在她父亲的要求下，遭受诊所称为严重伤害的 Quintana Arancibia 被转到 del Trabajador 医院。辩护律师通过 1989 年 2 月 6 日和 22 日以及 4 月 4 日书面材料向军事检察官陈述了所记录的数名证人的陈述。

E.6 智利共济会会员（智利总支）。据 1989 年 5 月 10 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

法院的一份请求保护书称，国家海军法令第 141 条为：“海军人员不得加入秘密的、或者秘密的等级制社团、团体或协会”。请求书指出，这项规定破坏了法律秩序形式与实质的统一。具体地说，它违反了宪法第 19 条第 15 款关于人人有权在不经事先允许情况下结社的保证。请求书接着指出，在这里，智利共济会会员就是受影响的人们，因为上述规定使共济会不能接纳海军中有军衔的杰出人士和海军普通成员，因为他们被禁止参加智利共济会团体。1989 年 6 月 16 日，该法院驳回了这项请求，其理由是因为请求人不是海军成员，因此它并不受上述海军法令的影响。最后，最高法院在 1989 年 7 月 19 日核可这项裁决，但两名成员投了反对票，他们认为请求人提出要求保护的补救措施的做法是合理的。

E.7 Manuel Gallardo Olate.1989 年 5 月 18 日提交圣地亚哥第二军事法庭的一份书面申请要求保释 Gallardo，因为他在审判前拘留期间已度过了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申请书指出，Gallardo 是一个行为举止无可指责的人，他的就业记录表明他不能被认为是对社会造成危险的人；因此他应得到保释。

E.8 Amelia de la Maza Yungue.据于 1989 年 5 月 22 日提交圣地亚哥第二军事法庭的一份书面请求书（第 1797-86 号案件）称，Amelia De la Maza Yungue 要求得到保释，因为她自 1987 年 9 月以来一直被拘禁，到目前为止审判前拘留时间已达 20 个月之久。请求书指出，Amelia de la Maza 是一个行为举止无可指责和品格值得效仿的妇女，其就业记录没有污点，也没有任何政治活动或恐怖活动的历史。在特别检察官拒绝保释她后，她于 1989 年 5 月 29 日向军事上诉法院提交了一份投诉书。

E.9 Raúl Cárdenas Alvarez.1989 年 5 月 24 日，军事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投诉书，控告军事上诉法院第一议事庭，因为该议事庭确认了 Cárdenas 的辩护律师为反对特别军事检察官的一项裁决所提出的以事实为根据的上诉。该特别军事检察官在其裁决中否定了关于取消将 Raúl Cárdenas 交付审判的决定的要求

(第 1510-87 号案件)。Raúl Cárdenas 的辩护律师在投诉书中坚持认为，根据军法第 123 条规定，作为原则问题，对拘押决定是可以提出上诉的。

E.10 Eduardo Pizarro Arriagada 和 Angel Erasmo Moya Romero 据 1989 年 3 月 9 日提交瓦尔帕拉索上诉法院的一份关于智利宪兵假释裁决委员会的投诉书称，自 1985 年 6 月以来，Pizarro Arriagada 和 Moya Romero 就作为“政治犯”一直被拘禁在瓦尔帕拉索恢复社会生活中心。根据投诉书所述事实，这两名政治犯均已达到了请求监狱特许所必需的行为、教育和工作方面要求。在 1989 年 1 月已服完其大部分刑期之后，这两名犯人向他们所在的拘禁机构假释裁决委员会提出了白天释放的请求。后来这两名犯人得到了答复其请求的通知。一直参加诉讼过程的 Ruiz Gamboa 少校和 Reyes 中校亲自告诉他们说，该委员会尚未作出决定，就再也没有对这种随心所欲的作法作出任何解释。代表智利宪兵的 Díaz 律师通知犯人的辩护律师说存在一种“误会”。

六、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其他指控

107. 特别报告员于最近收到了一些关于在迪尼达德移民镇——那里大部分是德国籍居民——据称有侵犯基本人权行为的投诉书。这些投诉书指控未成年人遭到虐待和酷刑、非法拘留及性虐待。

108. 这些投诉书促使智利政府请最高法院指定一名调查法官对迪尼达德移民镇的情况进行调查。

109. 政府的请求得到落实，该调查法官进行了调查，结果建议对两起违法行为提出诉讼。但是，他未能继续其调查，因为最高法院终止了他的任命并把调查工作移交给了一名普通刑事法官。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七、结论

110. 在本报告所涉及的六个月期间，智利境内的人权状况有所改善，证实了有朝着建立一种尊重基本自由制度前进的有利趋势，本特别报告员在自 1985 年 2 月开始执行其任务以来以往所提交的八份报告中均已指出了这种趋势。

111. 现在的情况与 1985 年有很大的不同，那时，该国处于戒严状态；国内行政流放普遍；作为全面压制制度一部分的酷刑和非法胁迫到处可见；曾两度实行紧急状态；政党被查禁；政府对各大学严加控制；共和国总统根据宪法享有过大的权力，这违背了宪法的民主原则并导致有损于各种基本权利，特别是不利于执法的权力滥用；该政权的反对者经常遭到恫吓，常常造成严重后果；数以千计的智利人被流放；警察、保安部队和武装部队用暴力行事，其行为超出权限，损害了智利人的基本权利；共和国总统对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也严加控制。

112. 最近，有利于保护智利境内人权的事件就是一些重要的宪法改革进行的公民投票。包括结束共和国总统至高无上的特殊权力、尊重政治多元化以及加强法治和加强、代议制的政治制度在内的这些改革于 1989 年 7 月 30 日得到了智利人民的赞同，从而更接近实现代议制民主政体以及因此对人权实行更有效的法律和政治保护的目标。

113. 上述变化是智利人民的努力以及智利政府采取更开放态度的结果，其中包括智利政府到 1989 年 3 月为止在特别报告员执行其任务过程中与其进行的非常令人满意的合作，智利的许多组织同样也给予了合作。努力争取为在智利有效行使人权创造有利条件这一整个进程将要在 1989 年 12 月和 1990 年 3 月达到最高潮，因为这是选举总统和选举国民议会参议院与众议院以及参议院和众议院就职的日子。这样，一个民主的、代议制的政治制度将要产生——其基本宗旨将是促进和保护每一个人的根本尊严。

114. 在撰写这些结论的时候，特别报告员相信，智利的政治进程将会继续发展，不会有什么重大挫折。在这一方面，为了促成智利人民所寻求和国际社会所希望的可喜结果，特别报告员想提请注意某些情况，这些情况继续对保护智利境内基本自由有着消极影响，而且如果不找到结束这种情况的办法，它们就可能有害于目前的民主进程。

115. 例如，酷刑依然存在，尽管是有选择地使用，也尽管规模有所减小。特别报告员认为，如果不完全停止使用酷刑，智利境内的人权状况就将妨碍智利人实现建立一种民主政治制度的愿望。

116. 除了酷刑之外，现在仍然有人指控政府机构或者显然与政府各种势力关系密切的团伙侵犯生命权、身心不容侵犯权、获得正当审判权和获得诉讼程序保证权，这种情况看来可以表明仍有一些反对目前政治进程的势力在起作用。

117. 在智利人的生活中，军事审判仍是最令人不安的因素之一，并对基本自由构成威胁。解除 Fernando Torres 上校的特别军事检察官职务，对于因危害国家安全罪和有关罪行而受到审判的那些人来说是极大宽慰。但是，他被晋升为陆军首席法律顾问就使得他能够干预民事审判和军事审判，因为这一职务使他必然成为最高法院的一名成员。

118. 宪法对民事审判的限制已被取消。因为宪法中关于紧急状态的条款已经修订。特别报告员相信，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法院履行其作为最重要的自由卫士这一艰难职责了。当然，法院的主要问题一向是它们自己的态度，因为除了少数明显例外情况之外，它们都屈从了政府的压力。

119. 对 1986 年 12 月 31 日在圣地亚哥严重袭击政府间移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和设施事件的调查未取得任何进展，一个自称为“9 月 11 日司令部”的团伙宣称对此事件负责。

120. 人的喉咙被切开、人被烧死、“基督圣体节”屠杀以及 1986 年 9 月谋杀

等臭名昭著的案件的调查亦未取得任何进展。

121. 由于执行大赦法，1973年以来的一些老的失踪案件尚未得到解决。

122. 对发生在1987年9月的五个新的失踪案件的调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23. 经司法部门判决的著名的工会领导人 Manuel Bustos 和 José Martínez 的流放继续严重影响着有组织的劳工的利益。

124. 因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其他有关罪行而被拘禁人员的监禁条件和审讯的进展情况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只在少数情况下条件略有改善。

125. 下述目标尚待实现，即确保根据法院命令而被拘留和被单独监禁的人可合法地得到他们所选择的医生的治疗。

126. 关于国民议会的与宪法有同等地位的紧急法令尚待生效，该法令对于享有政治权利和过渡到代议制民主政体具有紧迫的重要性。

127. 土著人的状况仍不令人满意，继续引起关注。

128. 恐怖主义仍严重地困扰智利人的生活，继续对行使人权造成重大障碍。恐怖主义还助长了那些极力主张建立一种无政府统治的人们的卑鄙目的，而这种统治有害于其目的为促进共同利益的最崇高的思想。

129. 特别报告员在其前几份报告中以及在本报告的某些部分中提到的智利政府给予的合作于1989年5月停止。与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这种作法对智利境内的人权事业是极有害的。

130. 当特别报告员由于健康原因不能继续执行其任务时，智利政府曾表示慰问，但同时宣布它将不再与特别报告员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合作，声称该委员会对智利的态度是歧视性的。

131. 特别报告员对智利政府的这一决定深感遗憾，他认为，正如在该国为促进尊重基本自由而工作的团体的正式发言人所确认的那样，这一决定是错误的，它违背了智利人民的利益。尽管该国政府关于歧视的说法有某些真实性，但他

相信与他的合作将会恢复。一国人民长远的利益必须高于国际社会的一些政治机构中某些时候所体现的利益。

132. 智利政府对特别报告员以往报告中所转载关于侵犯人权的指诉的答复——见本报告第三节——反映出该国政府为满足希望了解该节所载案件情况的要求作出了努力。但是，这些答复并未包括所报告的全部案件（见本报告第 19 和第 21 段）。再者，对于某些案件来说，答复是不完全的和不能令人满意的，特别是关于酷刑和虐待的指诉以及某些暴力死亡案件的答复就更是如此。

133. 关于本报告第三节所述情况，特别报告员指出，要求得到某些案件的资料的目的是要确定所提起的司法诉讼是否弄明白了所报告的侵犯人权事件以及是否在每一案件中都提供了适当补偿。根据目前现有资料，这个目的似乎并未达到。

134. 上述结论考虑到特别报告员从各种来源——政府来源和非政府来源——得到并经过充分比较的资料。本报告第二至第四节所载资料亦加以考虑。相反，特别报告员并未把本报告第五节所载资料作为其结论之根据，该节涉及对新的违反人权的指控，本报告已提请智利政府注意这些指诉，以便它能够作出答复。因此，特别报告员在从该国政府得到所要求的资料之前将不对这些指诉作出评估。

八、建议

135. 如果要实现保护人权方面的新目标的话，重要的是，目前的政治进程应当平稳地继续下去，直到在 1990 年 3 月 11 日建立一个民主的代议制政体。

136. 由于在由众多政党参加的自由公正的竞选中所表达的民众意愿而产生的任何政治制度必然存在的弱点，智利要建立的新政权必须把保障人权作为能体现其全体公民的生活进入新阶段这一特点的特别目标。

137. 这个新政权开始时在短期内可能出现的状况不应妨碍建立一种对所有自由加以有效的司法保护的制度。因此，把本国公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将比涉及政

治集团利益——无论它们如何值得尊重和具有考虑价值——的任何其他问题都将更加重要和迫切。

138. 必须立即停止酷刑。不可能有任何理由证明这种残忍和野蛮的做法是必要的。继续这样做，即使是以程度有所减轻的方式，也是建立真正民主体制的一种无法逾越的障碍，也是对智利人民的一种侮辱。

139. 同样，政府必须采取主动行动，确保其各机构不侵犯人的生命权、身心不容侵犯权、自由权以及合法安全权。

140. 政府还应注意与政府关系明显密切的团体或者政府某些部队威胁或侵犯自由的活动。

141. 现政府及下届政府所面临的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坚定不移地促进在军事审判的组织和实施方面的根本改变，以作为实行法治并因此充分享有人权的一项保证。

142. 民事审判也必须置于政府的密切监视之下，以便以一切现有手段对之加以推动，还要使它避免在政治方面受到挫折。这在目前是尤其必要的，因为最近的宪法改革有利于法院的工作，而且该国就要建立起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即法院系统能够在根据宪法制度指定它完成的维护人的尊严方面发挥作用。当然，为了做到这一点，推动改革的动力应当来自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本身的成员。

143. 对1986年袭击政府间移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与设施事件的调查取得进展是必要的。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怙恶这一暴行的罪犯，也会是对象政府间移民委员会这样有威望和重要的人道主义组织起了阻止作用。

144. 为了确保赏罚严明，从而加强正在进行的民主进程，最高法院、各法院、政府和各种政治势力必须更加重视对以下人士极端严重的案件的调查给予：喉咙被割断的人、被烧死的人、“基督圣体节屠杀”下死亡的人以及 José Carrasco 和 1986年9月被杀的另外三人。

145. 反恐怖主义斗争是智利人民的主要义务之一，以便确保为享有人权所付出的集体努力不致于被完全无道理的恐怖主义愚蠢行为所损害。

146. 必须作出坚定的努力以便为调查 1973 年以来发生的强迫失踪案件寻找一种新的合法途径。与此同时，新的失踪案件应得到政府和最高法院最大限度的关注，以便按照有法可依的国家条例将罪犯追捕归案并对他们加以惩处。强迫失踪案件是社会上可能发生的最有破坏性的现象，因为这类案件给受害人亲属造成长期痛苦。

147. 为了创造一种有助于向代议制民主政体过渡的和谐气氛，特别报告员再次建议智利政府赦免现在经司法机关判决流放的著名工会领导人 Manuel Bustos 和 Arturo Martínez。

148. 特别报告员再次建议，对于那些因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其他有关罪行而被拘禁和受到审判的人们，应尊重他们作为人的尊严。为此目的，必须通过严格按照正当审判的权利加快相应诉讼程序。还必须注意确保这类被拘禁者与普通刑事犯隔离开，以避免发生对其福利有害的严重冲突。

149. 必须不再拖延地实施关于国民议会及其任务与职责的法令，以避免与由国民议会成员监督保护人权进程相悖的状况进一步加剧。

150. 必须改变土著人、特别是马普切印第安人的状况，以使他们享有人权。

151. 为了人权事业的利益，法院系统应积极地推进进行中的对有关下述指控的报告的调查，即管理智利南部迪尼达德移民镇的人们据称与政府某些部队勾结下，侵犯该侨居地居民自由。政府对法院系统在执行其任务过程中给以所有适当援助也是可取的。

152. 鉴于智利政府与特别报告员的合作在该国人权状况方面取得积极效果，特别报告员在不影响本报告可能产生的其他建议以及尚未得到落实的以往报告所载建议的情况下再次强调指出，该国政府有必要恢复与他的合作。
